



高 教 动 态

(半月版)

2016年第10期
(总第70期)

嘉兴学院
发展规划处编
2016年6月30日

目 录

● 高教时讯

刘延东：落实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精神 推动全民科学素质实现新跨越	1
陈宝生任教育部党组书记	1
百余所高校共同成立高校教育扶贫委员会	1
教育部：推动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创新发展	2
2018年教育部将支持地方建200所优质高职院校	2
十一部门联手推动实体书店发展 每所高校至少有一个校园书店	3
中国计算机学会建议：教育部学科评估应取消排名	3
中国大陆二十六所大学入选亚洲大学排名百强	4
中国大学先修课程试点项目慕课发布会在京举行	4
山东高校2016年遴选3000名创新创业教育导师	4
湖北：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实名登记并专项帮扶	5
河北：将进一步简政放权 扩大高校财务自主权	5
天津：高校要专用区域内设立快递配送服务中心	6
我国首所应用技术大学开始秋招	6
上海中医药大学：建学术荣誉体系促学科发展	6
浙江：政校合作首设养老与家政产业学院	7
浙江工业大学发布“社会贡献度”蓝皮书	7
美国大学生找工作更关心薪水高低	7

● 决策参考

杜玉波：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强大人才支撑	8
张大良：创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教育	11

● 高教视点

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做教育不能急功近利	16
重视本科教育：一流大学成熟的标志	20
论高校内涵发展	28
从“大者通吃”走向“特色取胜”	37

● 他山之石

南开大学：“教学优先”的定位与探索	40
浙江大学：构建“基于创新的创业”教育	49
西安交大：推进科研体制机制改革激发人才潜力	54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小微课 大教改	55
长安大学：创新新生教育工程	58
西交利物浦大学：国际化不是目标 而是基因	60



高教时讯

刘延东：落实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精神 推动全民科学素质实现新跨越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6月22日下午出席全民科学素质行动实施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扎实推进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强大支撑。

刘延东强调，“十三五”时期是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的收官阶段，要聚焦青少年、新型职业农民、城镇劳动者、领导干部和公务员队伍等重点人群，瞄准社区、农村特别是边远贫困地区等关键环节，补齐短板、精准发力，分类实施科普活动，推动全民科学素质实现新跨越。要进一步健全科普共建机制，创新科普理念，完善科普设施，创作科普作品，弘扬创新文化，落实好政策激励措施，动员鼓励科研人员等全社会力量参与科普活动。刘延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把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把科普工作由“软任务”变成“硬措施”，共同推进公民科学素质建设。

2015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比例达到6.2%，比2010年提高近90%，全国达标科技馆总数155座。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6-6-23)

陈宝生任教育部党组书记

6月30日下午，中组部副部长潘立刚到教育部宣布中共中央决定，陈宝生同志任教育部党组书记，袁贵仁同志不再担任教育部党组书记。

根据简历，此前，陈宝生长期在甘肃省工作，曾先后任酒泉地委书记，甘肃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2008年进京任中央党校副校长，2013年起任国家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正部长级），既具有地方工作经验，又具有中央工作经历，既具有党政工作经验，又具有教育系统背景。

(来源：人民网 2016-6-30)

百余所高校共同成立高校教育扶贫委员会

中国扶贫开发协会高校教育扶贫委员会26日在京成立。来自全国各地的106个高校及团体作为首批理事单位，共同建立了中国扶贫协会领导下的第一个高校教育扶贫社会团体。《高校参与脱贫攻坚计划(2016-2018)》同时发布。

高校教育扶贫委员会拟通过对贫困地区开展“四类群体”的专项培训，实现“四

个助力”。一是通过贫困地区教师培训，提高贫困地区的教学水平，优化教育资源，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全面提升，助力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二是通过贫困地区群众技能培训，助力提升贫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的技能和本领，形成长效“造血”机制；三是通过贫困地区农村基层干部培训，助力提高基层干部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能力；四是通过贫困地区医务人员培训，助力改善贫困地区的医疗卫生水平。

教育部副部长朱之文指出，教育扶贫是脱贫的治本之策和长久之计，也是精准扶贫的着力点，教育部将对新成立的教育扶贫委员会给予支持和指导，并要求全国的高校和中小学都可以使用这个平台，参与扶贫攻坚战。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16-6-27）

教育部：推动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创新发展

教育部日前分别在北京、上海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重要讲话精神 推动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创新发展系列座谈会”。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深入学习领会和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重要讲话精神，推动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创新发展，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有力支撑进行了深入交流。

会议指出，要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战略高度，明确重点研究基地肩负的使命与责任，不断提升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创新能力，引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要创新治理模式，推动基地管理由过程约束向目标管理转变；创新科研组织方式，系统推进基础理论、应用研究和方法创新；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升重点研究基地的育人育才水平。要深化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综合改革，构建既能把握方向又能激发科研活力的体制机制，着力推进学术话语体系创新，让世界知道一个“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要进一步强化主体责任，形成责权清晰、充分调动积极性的管理体制机制。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6-6-20）

2018年教育部将支持地方建200所优质高职院校

从教育部获悉，到2018年，教育部将支持地方建设200所办学定位准确、专业特色鲜明、社会服务能力强、综合办学水平领先、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契合度高、行业优势突出的优质专科高职院校。北京、天津、浙江等30个省（区、市）今后3年预估将投入63.65亿元，建设313所优质专科高职校。

截至2015年，全国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达1341所，招生数348万，毕业生数322万，在校生数1048万，占到高等教育的41.2%，全年为社会提供技术培训超过2000万

人次。2013年以后，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率一直稳定在90%以上，2010~2015年高职毕业生毕业半年后平均月收入增长趋势明显，2015年比2010年月收入提高59.1%。

对此，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表示，高职教育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他表示，看高职教育是否“管用实惠”就要看高职教育的就业情况，看高职教育是否能解决毕业生生活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6-6-29)

十一部门联手推动实体书店发展 每所高校至少有一个校园书店

为进一步促进实体书店发展，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等十一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

《意见》指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以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相配套、乡镇网点为延伸、贯通城乡的实体书店建设体系，形成大型书城、连锁书店、中小特色书店及社区便民书店、农村书店、校园书店等合理布局、协调发展的良性格局。引导和推动高校加强校园书店建设，各高校应至少有一所达到一定建设标准的校园书店；鼓励在中小学校及周边开办实体书店。鼓励实体书店积极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在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

为贯彻落实《意见》提出的目标任务和各项政策措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日前在京召开全国实体书店发展推进会。中宣部、财政部、教育部等部委相关司局负责同志及各省（区、市）出版、发行、书店代表参加会议。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6-6-17)

中国计算机学会建议：教育部学科评估应取消排名

今年4月，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正式印发《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邀请函》，这意味着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工作正式启动。中国计算机学会公共政策委员会日前就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工作进行了讨论，形成如下看法和建议：

学科评估应该取消排名。这是因为以政府的名义将由公共财政资助的大学排列高低是错误的。学科发展状态是十分复杂的事物，任何按照某个指标体系打分加权形成一个排名的方法都不可能是科学的。

学科发展状态的评估在本质上不同于在竞技活动中给出成绩。后者虽然也反映长期的积累，但临场发挥的情况也是重要的考量。而学科评估则不然，本质上应该是看长期积累形成的状态，反而要避免超常的“临场发挥”。但如果规则就是指标体系、分项打分、加权汇总，以总分论排名，则各种“临场发挥”就不可避免，得到的结果不能反映学科的现实情况。

中国计算机学会公共政策委员会认为，开展学科评估，将评估结果公开，对学校是一次自我审视、相互促进的机会，对国家是一个掌握高等教育发展状态的方式，有积极正面的作用。但评估的结果不应该是大学学科在同一指标体系下的大排名，这将扭曲学科评估的意义，不利于教育的健康发展，其长期后果则是导致大学丧失特色，走向趋同。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6-6-30)

中国大陆二十六所大学入选亚洲大学排名百强

英国 QS 全球教育集团 6 月 14 日发布的 2016 年“QS 亚洲大学排名”显示，26 所中国大陆大学进入亚洲百强大学行列，比去年新增 1 所。排在前十的两所中国大陆大学分别是第五名的清华大学以及第九名的北京大学。

据介绍，今年的最新排名在去年的基础上增加了 50 所大学，对亚洲地区前 350 所大学进行排名比较。今年中国共有 124 所大学入选，其中，中国大陆 82 所、香港 7 所、台湾 34 所、澳门 1 所；日本和韩国则分别有 74 所和 54 所大学进入榜单。

今年新的排名在综合考察一个大学在亚洲的科研、教学、毕业生就业、国际化、学术影响力等 9 个指标的基础上，新增拥有博士学位教职工数量的指标。从单项指标来看，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该新增指标上获得了 100 分满分的优异成绩。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在论文篇均引用指标上排名亚洲前十，分别为第五、第九和第十。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6-6-16)

中国大学先修课程试点项目慕课发布会在京举行

中国大学先修课程试点项目慕课发布会 24 日在京举行。会上宣布中国大学先修课慕课官方网站在“爱课程”网正式开通，首批 30 门课程率先上线并免费向全社会开放。

2014 年 3 月，中国教育学会联合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发起组织“中国大学先修课程试点项目”，旨在使学有余力的高中生能根据自身兴趣和能力自主选择、自愿学习，帮助其为大学学习乃至未来职业生涯做好准备。

据介绍，目前已有 100 多所国内优质高中加入中国大学先修课试点，近千名中学教师接受了相关培训，1 万余名学生学习了中国大学先修课程。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6-6-25)

山东高校 2016 年遴选 3000 名创新创业教育导师

山东省决定 2016 年遴选 3000 名创新创业教育导师，培育创新创业教育师资队伍，构建校内外、专兼职相结合的创新创业教育导师队伍。

山东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导师分为创新教育导师、创业教育导师、学科专业导师三类，申报每一类导师都有相关的具体要求。入选导师实行年度考核制度，山东将对导师库实行动态管理，同时构建导师共享机制，高校可以在相应系统中查询导师信息，根据需要遴选、聘请合适的导师从事本校创新创业教育，并按规定给予相应报酬，以此促进单位间的资源共建共享。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6-6-29)

湖北：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实名登记并专项帮扶

湖北今年将加大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的扶持力度，对全部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逐一开展实名制登记，重点对就业困难的毕业生实行“一人一策”专项帮扶。

今年湖北省应届高校毕业生将达到43万人，目前部分大学毕业生就业预期与用人单位实际需求存在错位，一些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观不切实际，存在“高不成、低不就”现象。为破解这一难题，湖北推进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名制帮扶。依托乡镇、街道和社区的就业基层服务平台，从教育部门和高校获取未就业毕业生实名信息，逐一开展实名制登记。通过提供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就业创业培训或小额担保贷款等服务，使这些未就业毕业生尽快实现就业或参加到就业准备活动中。

对低保家庭、社会孤儿、烈属、残疾等就业困难的毕业生，湖北省提供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按照每人8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求职补贴。为搭建相互选择、相互适应的对接平台，湖北今年还将继续为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提供见习岗位，并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60%给予就业见习补贴，帮助他们积累工作经验，顺利找到工作。

(来源：新华社 2016-6-17)

河北：将进一步简政放权 扩大高校财务自主权

河北省日前决定，进一步简政放权，多方面扩大省内高校办学自主权。今后在财务管理、专业设置与调整、教职工招聘等方面，将充分尊重高校主体地位，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不再过多插手高校相关事务，把工作重心放到加强监管、优化服务上来。

河北规定，中央和省级安排的高校生均拨款等专项经费，由省教育厅、财政厅根据高校在校生人数、学生层次类别、学科专业类别等因素，提前分配下达到高校，列入高校年初预算。省财政厅每年下达各高校的财政补助事业费限额，由高校自主安排人员经费和正常公用经费；下达各高校的专项经费，由高校根据学校事业发展计划和专项经费用途，自主提出使用意见，确定具体项目。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6-6-21)



天津：高校要专用区域内设立快递配送服务中心

为维护高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和生活秩序，彻底解决快递进校园“最后一公里”难题，天津最新规定，高校要通过引进具有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资质且经营多家快递品牌业务的第三方快递企业，在校园安全隔离的专用区域内设立快递配送服务中心，为学生提供快递服务。

天津市教委联合天津市邮政管理局出台的《天津市高等学校快递服务进校园管理办法》明确规定，高校可建立岛式或围墙式两种快递服务专用区。企业要按照相关要求，配备可拆卸智能快件箱、实名收寄设备、验视记录仪、视频监控等设施设备，并与邮政管理部门安全监管系统联网，从业人员需持有行业监管部门核发的电子从业认证卡，确保收寄过程有记录、安全问题能追溯。

（来源：新华社 2016-06-15）

我国首所应用技术大学开始秋招

作为全国首所由高职院校升级为应用技术教育本科的高校，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日前开始秋季招生。

据介绍，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主要培养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学校首批设置3个本科专业，学制四年，分别是飞行器制造工程、机械电子工程和自动化，均是中德的优势专业，面向“中国制造2025”国家战略。今年秋季，中德将在河北、天津、山西、山东、辽宁投放330个秋季本科计划。

（来源：新华社 2016-6-21）

上海中医药大学：建学术荣誉体系促学科发展

上海中医药大学近日推出高峰高原学科“学术荣誉体系”，学校与首批62名教授签订3年目标合同，实施协议工资，推动学科高水平发展。

该校首批学术荣誉体系教授包括7名首席教授、24名讲席教授和31名特聘教授，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有机结合，发挥专家教授在学术事务中的主导作用。通过建立校院两级学科人才工作机制，明确学科人才建设的责任和义务，同时实施配套的人事薪酬制度改革，调动高层次人才的积极性。

该校拥有中医学、中医学两个高峰学科和中西医结合、科学技术史两个高原学科。“学术荣誉体系”在前三个学科先行启动。据介绍，高峰高原计划50%经费可用于教师队伍建设，为引进培养高层次人才、开展高水平学科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6-6-21）

浙江：政校合作首设养老与家政产业学院

浙江省民政厅近日与浙江树人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探索养老人才培养和服务的政校合作新机制，共建“浙江省养老与家政产业学院”。首批相关专业本科生今年开始招生。与此同时，双方还将共建“浙江省养老服务与家政管理人才培训基地”，共建“智慧养老与家政服务协同创新中心”，提升养老与家政领域的应用型学科建设。

此次政校合作采取“一院一地一中心”模式，以招收养老与家政产业本科生为主，搭建中职、高职、本科学历教育“专业群”和贯通桥梁。本、专科（高职）每年招生均不少于100人。浙江所有民政系统旗下的养老、社会福利机构，都将为相关专业毕业生提供实习、就业机会。

（来源：新华社 2016-6-24）

浙江工业大学发布“社会贡献度”蓝皮书

日前，浙江工业大学发布“社会贡献度”蓝皮书，从社会贡献的视角全面梳理十二五期间人才、学科、科研的成绩。蓝皮书分为“综合篇”“产业篇”“智库篇”三大篇章，重点介绍了学校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七大产业、专家教授扎根浙江的科研成果、学生创业典型等内容，并通过大量的数据，列举了产学研一体化为地方贡献的产值、利税等。

该校党委书记梅新林表示，这是国内高校第一本贡献度蓝皮书，体现了一所地方大学与区域发展紧密结合的办学理念，为今后的科学的研究和产业化明确了指向。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2016-6-27）

美国大学生找工作更关心薪水高低

美国新媒体 Quartz 日前刊载文章，公布了一组美国新毕业生找工作相关统计。统计结果来自于自由职业者平台 TOPTAL 针对 1000 名美国毕业生的问卷调查。调查显示，今年美国大学生找工作时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是岗位薪水的高低。62%的受访者声称高薪水是找工作时最优先考虑的要素，只有 15%的毕业生宣称最关心首份工作是否能给自己提供快速晋升的机会。文章承认，TOPTAL 这个调查的样本人数较少，不过它的结论与去年微软公司所做的 1000 人同类调查结果大相径庭，去年微软的结论是能否加强自身沟通能力、能否快速晋升等要素是毕业生找工作优先考虑的。文章认为，“千禧一代”（指 20 世纪 80 至 90 年代出生、成长于计算机和互联网时代的一代人）在找工作时更在意薪水问题，这可能源于他们为读大学所负担的学生贷款压力。

（来源：《光明日报》2016-6-21）



决策参考

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强大人才支撑

——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杜玉波答本报记者问

记者：杜部长，您好！请问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应当怎么认识和判断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走向？

杜玉波：大学要始终与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同向同行，这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重要经验。我认为当前高等教育发展最重要的有四个特征。

一是发展环境从供给驱动向需求驱动转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不断加快，人才市场的供需关系也在发生深刻变化，过去是由高校为主导的供给驱动，现在更多的是用人单位为主导的需求驱动。有人说，我国高等教育正在从“卖方市场”逐步走向“买方市场”，以前的大学生都是“天之骄子”，“酒香不怕巷子深”，现在是“皇帝的女儿也愁嫁”。高校应该树立市场竞争意识和优胜劣汰的危机感，在对接行业产业需求、优化调整人才培养结构上主动作为、有所作为。

二是发展定位从适应服务向支撑引领转变。我国正在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社会对先进科技和高素质人才需求日益增加，高等教育正在走向社会的中心，角色定位从过去的适应服务逐步转向服务和支撑引领同步。创新驱动实质是人才驱动，产业升级首先是人才升级。美国硅谷的崛起是因为它靠近的斯坦福大学起到了发动机的作用。高校应该坚持需求导向、合理定位，自觉地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贴紧靠实，实现深度融合。

三是发展方式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我国高等教育正在从以规模扩张为特征的外延式发展，转向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高校应该把发展重点从过去的拼规模、拼数量转向在稳定规模的基础上拼质量、拼内涵，提高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供给能力和水平，实现由“以量谋大”到“以质图强”的战略转变。

四是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向改革驱动转变。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的中后期，正在逐步从要素驱动转为改革驱动，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激发和释放发展活力。高校必须抓住机遇，因为抓住机遇就会赢得未来、丧失机遇就会落后一个时代，这是许多高校发展的启示和经验。我们不能再依靠零敲碎打、缝缝补补过日子，必须下决心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上做文章，理顺内部关系、争取外部支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记者：请问您认为高等教育要履行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重大使命，应当重点把握什么问题？

杜玉波：任何时候高等教育都要把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核心使命。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高质量人才和高水平科研的支撑，是当前高等教育最重要的历史使命和战略

任务。履行好这个使命，要做的工作很多，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要解决好结构调整问题。当前毕业生就业难的根源在于结构性矛盾。一方面，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用人需求下降，总量压力很大。另一方面，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最为需要的应用型、复合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十分紧缺，人才的供给和市场需求“对不上”。造成这种情况，重要原因在于一些学校定位不科学，学科专业特色不明显，人才培养的类型、层次不清晰，缺乏与行业和区域发展需求紧密结合的机制。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快结构调整，找准发展定位和服务面向。

要坚持学科有选择性发展，有所为有所不为。学科专业不在多、不在全，而在特、在强，在处理学科专业的存量和增量问题上，都要坚持这样的思想。对现有学科专业格局，学校一定要有宏观把握和科学设计，既不能一成不变，也不能因人而设随意变，关键要集中建设好与本校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相匹配的学科专业群，压缩“平原”，多建“高峰”。事实上，世界一流大学中没有一所能够覆盖所有学科专业，而我们的不少高校却在热衷追求所谓“综合性”“全科式”发展。高校学科专业上的盲目布点、重复设置、“多而散”的功利行为，现在看来问题很大，必须痛下决心建立学科专业设置的预警机制，把就业状况反馈到人才培养环节来，科学合理设置学科专业。

当前，还有一个倾向也要避免，就是层次类型不能盲目攀高、一味追求学术型，而要形成梯度、对接需求。今后研究生教育要以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为重点，坚持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协调发展。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更多地要以提高创新能力为目标，而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更多地要以提升职业能力为导向。本科教育的定位是要培养适量的基础性、学术型人才，但更重要的是要对接国家战略和区域需求，加大力度培养多规格、多样化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记者：现在不少高校都很关注“转型”问题。您认为高校为什么要推动转型，怎么推动转型？

杜玉波：高校为什么要推动转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高等教育所依存的这个经济社会的大环境在转型。经济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必然要求高校的办学思路和人才培养模式作出相应调整。“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动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在推动转型的问题上，我们的态度要坚定，不能动摇，也不应当有疑虑和观望。

推动谁来转型？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讲，所有高校都面临一个转型的问题。但具体到高等教育内部来看，地方本科高校尤其是2000年后新建的这批本科学校转型发展的紧迫性相对要更强一些。因为从面上来看，这些学校存在的学科专业趋同、人才培养模式滞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不足、就业结构性矛盾等问题比较突出。

转型转什么？不是“挂牌”，不是更名，不是学校升格，绝不是说换个名或者升一格就叫转型了。转型的核心是结构调整和内涵转变，明确办学定位，把办学思路真



正转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来，转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上来，转到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上来，转到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上来。具体来说，就是紧紧围绕创新驱动发展、“中国制造 2025”、“互联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战略，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突破口，推动学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专业课程设置、实践教学资源、教师队伍建设等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上转。

怎么推动转型？关键要处理好中央和地方、政府和学校的关系。在关注和支持地方高校以联盟等形式推进转型的同时，需要进一步明确政府主导转型发展的方向。国家层面关键是做好顶层设计、政策支持和典型引导。顶层设计方面，《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明确了转型的思路方向和关键举措。政策支持方面，通过招生计划、师资培养、合作办学、财政倾斜等措施，重点扶持奖励那些在体制机制上有突破的高校，推动省级政府开展地方高校转型发展试点。这里，我还要特别说两句话：一句话是转型的主要责任在地方。各地经济结构和产业发展需求有很大差异，省级政府应当对本省、本地区高等教育结构和高校的布局规划做出设计，调动省内资源支持本省高校的转型。另一句话是转型的主体是学校。每个学校转型的规划和方案，都应当由学校自己确定，这样既利于充分调动学校在转型上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也是高校办学自主权的体现。

记者：最后，请您介绍一下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应当重点解决好哪些问题？

杜玉波：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提升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奠定长远发展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去年，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的《总体方案》，国务院以专门文件印发下达。《总体方案》指出，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要以一流为目标、以学科为基础、以绩效为杠杆、以改革为动力。这就明确了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总的指导原则和建设方向。“十三五”规划也指出，“提高高校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使若干高校和一批学科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我理解，学科水平是一所大学核心竞争力的集中体现，学科特色是一所大学最根本的特色。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首要的是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当前落实好《总体方案》和“十三五”规划，要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解决中国高等教育服务和支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这是国家的大局，是第一位的问题。二是解决中国所有高校都要争创一流、办出特色的内在动力问题，这是让所有高校都能感到有希望、有奔头，办学积极性都能得到充分发挥的需要。三是解决一流学科建设的目标和路径问题，这是把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的迫切需要。我们必须站在这样一个高度，对统筹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进行总体设计。具体来说，一是突出学科导向。以学科为基础，面向学科建设水平高、具备较好建设条件的高校，统筹学校整体建设和重点建设，通过一流学科重点突破，带

动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使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二是改革遴选支持方法。充分依托第三方评价，参考借鉴国内外有影响力的学科评价要素，综合高校高水平学科建设成效、办学质量、重要贡献和国际影响力等情况，采取认定方式确定建设一流学科的高校，重点支持一批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学科，重点布局一批国家急需、支撑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发展的学科。三是打破身份限制。设立高水平准入门槛，建立公平竞争的遴选机制、有进有出的激励约束机制，始终保持一流学科建设的活力和竞争力，在公平竞争中体现扶优扶新、扶需扶特，努力形成支撑国家长远发展的学科体系，引导不同类型的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四是强化质量管理。进一步增强高校财务自主权和统筹安排经费能力，完善经费管理方式，提高经费使用效益。实时动态监测，制定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办法，开展中期建设的绩效评价、周期结束后的总体评价，强化过程管理，建立退出机制。总之，没有固定身份，没有一劳永逸，一流建设永远在路上。

（来源：《学习时报》2016-6-20）

张大良：创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本科教育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从国家发展战略全局对提高教育质量做出重大部署，明确提出要提高高校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使若干高校和一批学科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2015年，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明确了“双一流”建设的总体要求、建设任务、改革任务与支持措施。

今年4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清华大学建校105周年，强调办好高等教育，事关国家发展，事关民族未来；我国高等教育要紧紧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源源不断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他鼓励清华大学要坚持正确方向、坚持立德树人、坚持服务国家、坚持改革创新，面向世界、勇于创新、树立自信、保持特色，广育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各类人才。4月26日，在视察中国科技大学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在开放中推进自主创新，要对中国建设国际一流大学、培养国际一流人才充满自信。

4月15日，李克强总理视察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并在当天召开的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座谈会上强调，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础，关系民族的未来，高水平教育是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体现。要加快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促进壮大新经济、培育新动能，推动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

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关于新时期加快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为我们创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教育指明了方向。一流本科教育是一流大学的立校之本，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石。建设一流本科教育是一流大学建设的题中之义，对于推进高等教育科学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期盼具有重要意义。林蕙青副部长在开幕式的讲话中，结合世情、国情、教情变化，全面阐述了一流本科教育在“双一流”建设中的基础地位、本质要求、重要意义，重点部署了深化教学改革的主要任务，强调要更新教育理念、深化创新创业教育综合改革、调整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大力开展校地校所校企协同育人、提升国际合作培养人才水平、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继续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简称“拔尖计划”)、加强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同时通报了教育部已经和将要出台的若干重要举措，包括建立一个管理信息平台、制定两个管理文件、实施三个专项、推动四类评估，从而支持、服务、监管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作，促进高校提升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

创建一流本科教育，首先要做好已有经验的总结和继承创新。近年来，在一流本科教育建设方面，我们已经进行了很多探索和实践。在教育部层面有个典型案例，就是2009年启动实施的“拔尖计划”，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19所重点大学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科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建立了一批国家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基地。

“拔尖计划”实施近8年来，在体制机制、学生选拔、培养模式改革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探索了“一制三化”(导师制、个性化、小班化、国际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已培养出三届本科毕业生2500名，支持本科生总数累计达6500名。三届毕业生中，96%的学生继续攻读研究生，其中有50%的学生进入了排名前100名的国际知名大学深造，15%的学生进入了排名前10名的世界顶尖级大学深造，初步实现了成才率、成才率高的阶段性目标。“拔尖计划”的学生普遍展现出既有远大理想又具脚踏实地的精神风貌，在批判性思维能力、知识整合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方面表现突出，部分学生已在学术领域崭露头角，在世界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在国际大赛上表现优异。国际一流学者评价，“拔尖计划”拥有“最优秀的本科生和最优秀的本科教育”“领跑者的示范作用突出”。我认为，“拔尖计划”是一个以当今国际学术大师来培养未来国际学术大师的计划。近几年实施这个计划所取得的经验、做法值得在推进一流本科教育中借鉴。

这两天研讨过程中，各位校长和专家学者所作的系列主题报告、分论坛专题报告，汇聚了一系列重要的教育理念、人才培养理念和办学理念，使大家分享了多年来各高校在本科教学改革方面的有益探索、有效实践的经验、做法和成果。我认为，许多改革创新成果是值得高校之间相互学习借鉴的，也是可以在面上推广的。校长和专家学者们对一流本科教学内涵和特点的阐释，对一流本科教育建设面临的挑战和存在问题



的深刻分析，对解决问题、破解难题所提出的对策建议，对高教司的工作来说，是有直接帮助的，是非常重要、十分及时的，我们会认真研究吸纳大家的意见建议。

研讨会上各校介绍的经验，符合文理工农医财经政法各学科的特点，尽管做法各异，但有其共同点，都强调要强化人才培养在学校的中心地位，要突出以学生为本、以学生的学习和发展为中心，要充分体现教师队伍是提高教学质量的第一资源、创新是改进教学的第一驱动力。大家提出并已付诸实践的许多理念、举措具有重要的推广价值。如我国高等教育正在从大众化后期走向普及化阶段，必须有选择地实施精英教育、培养引领型精英人才。如我们必须牢固确立以本科为本的办学定位，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的办学理念，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相结合的教育理念，跨界培养人才的教学理念，就是要通过跨学科、跨专业、跨院系、跨学校、跨国度、跨文化来培养人才。如我们要充分认识本科教育在大学的基础地位和独特性，没有本科教育则大学不复存在，没有本科教育的大学等同于科研机构，因为大多数科研机构既开展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也培养研究生。如优先保障本科教学的经费投入，实施学费收入全额用于本科教学，不断完善教学设施，加大体育和美育设施投入建设，实施小班教学，建立基于对话交往的互动式师生关系，基于学生学习成果的教学评价，基于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和行动研究的教学改革，基于学时、学分、学程、学位的教学管理体系建设，基于教学全过程、全方位的内部质量控制体系、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推进实践育人改革，深化实习实训实践教学改革，深化校企、校所、校地协同育人的培养模式改革，深化对接学科前沿、行业产业企业需求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加强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深化有利于增强学生学习内驱力的教学改革，深化翻转课堂、线上线下互动融合式教学方式方法改革，实施学生学业成绩过程评价、综合评价、多样化评价，深化国际合作交流，等等。我认为，这些经验、做法和成果十分重要。只要我们对各高校现有的经验、做法和成果进行梳理、整合、提炼，就能回答两个基本问题：什么是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教育？我们怎样建设一流本科教育？下面我围绕一流本科教育建设谈几点意见，和大家交流。

一、创建一流本科教育，应当成为高水平大学办学的重要使命和目标追求

高校领导要高度重视，校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要经常研究本科教学工作，要有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导向和工作措施，切实解决教学中的突出问题、回应师生关切。学校抓本科教学的工作重心要下移到院系、下移到每一位教师。我们把院系比作“车厢”，那么过去我们靠学校领导层这个“火车头”来带，“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因为只有火车头是动力源，而现在是“动车组”，每节“车厢”都有动力源，因此要把工作重心下移到院系，发挥院系作用，抓好本科教学。同时，通过院系把工作重心下移到教师，用激励政策及机制调动教师搞好教学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要优化资源配置方式，将一流资源配置给本科教学，确保本科教育和教学改革所需经费，努力把更多优质资源聚集到人才培养上来，把学校的一流学科、一流科研优势和成果转化成本科教学的优势和教学内容。

要完善教学管理制度，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教学管理制度和主动服务师生的教育教学管理队伍，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人才成长的教学文化氛围。形成教师有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高涨的教学热情、教学激情，学生有高度的学习自主性、积极性、创造性，以及师生互动的教学生态。学校有科学完善的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有健全的弹性学制、跨院系选课、注重学生学习方法和思维训练等适应个性化学习需求的配套管理制度，鼓励学生根据自身特点和学术志趣自主选择专业、自主选修课程、自主选定研究课题和创新创业项目，实现全面发展基础上的个性发展。

二、创建一流本科教育，应当抓住教师这个关键要素

没有一流的教师队伍，一流本科教育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要建设“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教师队伍，引导教师钻研教学，淡泊名利、潜心治学、追求卓越。

要加大力度组织教师开展教学研究。教学团队、教研室等都是有利于提高教师教学水平和能力的组织形式，要因校制宜，积极为教师搭建研究教学工作、开展教学改革的平台，并提供政策与资金支持。

要健全系统完备的教师培训制度。现在进校的新教师大都博士毕业，科研能力强，但又大都没有经过系统的教育教学理论、教学方法、基本教学规范和有关法律法规的学习训练，因此高校要建好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完善运行机制，加强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培养，青年教师不管职称高低，都要补上助教经历。

要着力完善教师评价制度。完善教师分类管理和分类评价办法，积极引导教师加大对教学的投入，鼓励教师把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要鼓励高水平教学团队编写高水平教材。一些学校在职称评定过程中，实行教学工作与科研工作、教研项目与科研项目、教学成果与科研成果、教学带头人与科研带头人一视同仁的办法，值得借鉴。

要充分发挥名师的引领示范作用。汇聚一批热爱教育事业、学术造诣深厚、教学经验丰富、具有国际视野的名师大家参与本科生教育教学，充分发挥名师在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中的骨干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还要及时总结宣传广大教师积极投身教育教学改革实践的先进事迹和成果，在高校推动形成以本科教学为责、为乐、为荣的文化氛围。

三、创建一流本科教育，应当紧扣培养创新创业人才这个目标任务

高校要树立科学的人才培养质量观，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着力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法治意识、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着力提高本科人才培养质量，为社会输送大批优秀创新创业人才，为研究生层次人才培养输送高素质生源，为未来各学科领域的战略型人才和各行各业的领军人才培养提供优质



后备力量。当前，创新驱动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创新要素跨国流动，创新资源全球配置，创新活动日趋活跃，以知识资源为基础、以创新能力为决定力量的新的国家竞争格局正在形成。各国都在寻找科技创新的突破口，抢占未来发展的先机，一个共同的战略选择就是大力提升高校创新能力，培养创新型人才。我们创建一流本科教育，就要着力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注重培养学生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意识，开展启发式、讨论式、探究式教学，激发学生丰富的想象力，打牢知识根基，拓宽学术视野，提升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造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主力军，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提供不竭动力和人才支撑。

我们评定高校是否办出一流本科教育，有5个最基本最核心的观察点：一是学校是否具有一流的师资队伍；二是学校是否有政策制度保障一流的师资配备到本科教育；三是学校是否把一流学科优势和一流科研优势转化为教学优势；四是学校的一流科研成果是否及时转化为教学内容；五是学校是否培养出一大批优秀创新创业人才。

在本次论坛开幕式上，厦门大学邬大光副校长强调：具备一流本科教育是一流大学成熟的重要标志。我们坚信，经过大家不懈努力，未来十年我国一定会涌现出若干所社会公认、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一流本科教育高校，这些高校将引领一批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大学逐步走向成熟。

（5月6-7日，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厦门大学联合主办，厦门大学高等教育质量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承办的“一流大学本科教学高峰论坛”在厦门大学召开。本文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张大良在论坛上的讲话）

（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16年第6期）



高教视点

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做教育不能急功近利

6月26日，在第十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做客新华网思客会并接受专访，深入解读有关高考、就业、高校改革、人才培养等话题，思想在对话中不断升级。以下根据专访实录整理：

教育的本源是人的教育

思客：您认为现在中国高校的改革需要突破的首要问题是什么？

龚克：2010年制订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教育界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即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这回到了教育的本原，就是教育是为了人的。它培养出来的是一个高素质、适应社会发展、可持续的人群，而不仅仅是传授具体知识和技术，我们把知识、技术的传输当作是人的发展的载体。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法。

但是比较可惜，已经时间过半了，这个主题还没有完全彰显出来，虽然我们提出很多综合性改革，但是目前的教育改革还是碎片化的。

思客：您是南开大学的校长，您觉得大学具体应该怎么样去做？

龚克：我觉得一定要把教育的全部目的指向人。以大学为例，大学的根本使命是以德树人，以学生的成长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觉得这是教育本质的意义所在。

我们搞科研不同于科学院搞科研，不同于企业研究所搞科研，不同于银行研究，我们必须立足于人的培养。中国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必须看到其中的不足，就是我们把人自身的发展放在了比较次要的地方。

南开在推“三个转变”，做教育不能慌忙急功近利

思客：您是实践者，您在南开大学具体是怎么做的？

龚克：我们在学校推“三个转变”，第一个转变是我们要以学科为本转变为学生为本。衡量一个学校好坏，不是看它的学科排第几，而是学生的发展，这是办学观念上的转变，这个转变是非常难的。一是难在过去我们把学生的培养看作是未来的就业需要，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这个观念不仅反映在我们教师、学生、家长身上，也反映在政府对教育工作的指导上面。更难的是现在学校发展采用了很多的计量学的办法，把学科的发展、把学科的排名作为衡量学校是不是办得好，学校的资源配置是不是要加强的标准，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干扰。我认为教育是百年大计，要静下心来做，老是慌慌忙忙地靠排名、颁奖来办教育，这不是一个踏踏实实办教育的思路。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观念一定要转变。这个观念的转变不是一个学校转了就可以的，需要全社会来转变。

第二个转变是我们在教学模式上要从知识传授拓展到素质发展。过去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我们谈素质教育的时候，谈的不是全面素质，而是搞点体育活动、文艺活动，我们经常见的提法叫知识、能力、素质。这样一看，素质是在知识、能力之外的，素质往往被看成是跑跑跳跳、吹拉弹唱，家长说素质教育增加了负担，高考又不考这个，搞一些没用的东西。

所以回到教学本意的时候，素质是在先天的心理和体质的基础上经过后天的学习、锻炼，环境作用而发展出来的相对具有稳定性的他的品德、知识、能力、作风。它首先要包含知识、能力，但是不限于知识和能力的更全面的一个概念。所以我希望建立起这样一个全面发展的素质观，而不是仅仅把它作为知识和能力的补充。

第三个转变是要转变教学模式，从以教为主的模式转变成以学为主、教学相长的模式。尤其对大学来讲，学习者是成年人，尤其要作为创新一代创新是主动的行为，在成长的过程中大学给他的影响应该是主动作为的人，主动学习、主动研究、主动实践，而不是我教你学、我讲你记、我考你答，处在一个被动的地位，那么这就要求我们有很大的变化。举例来说，我们现在更多的是“三练、二考”，这就造成学生特别愿意老师给他划范围，而我们更看重学生对体系的掌握，而不是对点的掌握情况，所以就不能划范围。我们想利用这样模式的转变去撬动整个改变，这是我们想做的事情，当然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允许休学创业，但学业永远是第一位

思客：在创新创业战略下，高校也都在做双创教育，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龚克：我们现在讲创新创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现在听到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说你要提高学生毕业生的创业比例，这固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我理解创新创业的教育是为了我们国家成为创新型国家，培养一代新人。他是敢想、敢做的一代，而不仅仅是听话、循规蹈矩的一代。

所以创新创业教育的成功与否不在于这些人要开多少家公司，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学生参加了创新创业的实践以后，最后还是会考研究生，还是会考公务员，还是会到中国移动、银联去就业。但是这丝毫不损害他在学习期间参与创新创业实践给他一生成长带来的好处。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他是不是自己开公司作为我们创业教育成败的衡量。

另外一个评判方法，就是看创业团队的成功率，看他们是不是拿到了A轮融资，多少年可以盈亏平衡，多少年可以上市……仅仅以此评价我觉得也是不够的。创新创业是着眼于人的，失败的经历对一个人最终的成功可能是极为有益的。

思客：很多省份开始制定类似休学创业这样的政策，作为大学校长，您怎么看学业和创业的关系？

龚克：我去年曾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说怎么看创业教育，因为在学校的一次讨论会上，有一个同学很尖锐地给我们提了问题，当时我们正在做



众创空间，他说南开用房非常紧张，自习教室都不够，图书馆座位也不够，但是你拿出钱来搞众创空间，这符不符合南开的办学定位，会不会把铜臭气引进来，毁了办学的宗旨。这个同学提的意见非常尖锐，非常值得我们思考。

众创空间到底是不是为了办几个公司，这几个公司办得好给学校回馈一点资金，这是不是办众创空间的目的？不是，我们办众创空间是为了给学生提供创新实践的平台，我们希望空间办得大一点是希望给更多的学生提供空间，让学生通过众创空间的实践了解社会需求，了解市场，了解跨学科团队合作。比如山西临县的枣，我们教师和他们有农业方面的合作，去年年底我们得知黄河河滩的枣虽然质量很好，大获丰收，但是卖不出去，创新创业实践的同学们开始觉得很简单，电商就可以了，他们马上介入，结果后来发现这个事情真的不是那么容易，之所以滞销是因为交通不便，那里网络都不通，同学们在大城市习惯的东西到那儿以后就不行了。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就发现任何一个单一的学科都不够用了，搞网络的不够、搞营销的也不行，他们就组成多部门团队。他们在网上推销大枣，他们发现接电话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一个同学在接电话的时候急得直哭，因为别人总觉得他是骗子，他不会跟人交流，怎么回答好别人的问题，让别人信任他，所有这些环节给了他们很大的锻炼，他们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面帮忙销售了大量的枣，上千万的营业额，他们很有成就感，这些钱并不是赚到他们口袋里，更重要的是他们体会了什么叫真正的社会需求，怎么通过应用自己的知识满足社会的需求，以及怎么弥补自己知识的不足。

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做这个是干什么的，后来我看到有一个学生晚上十一点多在那儿一边吃泡面一边上网，我们从中看到了什么？看到这是学生的主动行为，他爆发出来的积极性是以他主动作为为基础的，这是在我们课堂上不太容易看到的，因为课堂上总是被动的角色，所以我们怎么能用这个来撬动我们的教改？

我们不能把创业和学业截然分开，把创业看作和学业完全无关的另外一件事。前两天我们一个政治学的博士创业者，他还是我们的在校生，我说你是政治学，不是学金融的，你搞这些创业活动对你的学习成长有帮助吗？还是你打算一旦你经济来源稳定了你就放弃学业，他说还真不是，他是学政治学的，他希望给创新创业活动带来些社会角度。

今天上午我们很多高校在一起讨论创新创业教育的问题，我想立足于培养人这个角度，可以把学业和创业有机地结合起来，但是这个说是好说，但是时间是冲突的，你不可能同时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允许休学创业，请注意，是允许，不是鼓励。

允许创业需要把我们的教育搞活，教育应该真正以学生为本，以学生的成长为本，应该怎么有利于学生成长就怎么设计我们的制度，而不是以授课怎么成体系、考试怎么好组织等来设计教学制度和机制，从这个角度我觉得创新创业对教改有一定的意义，但是作为学生一定要明白学业第一，要让学业和创业有机地结合，通过创业实践激发学习的主动性，激发求知的渴望，如此形成良性的互动。

市场前瞻性不足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率

思客：数据显示，10年来，中国发表的文章在全世界增长最快，已成为学术文章第二大产出国。但是与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相比，中国高等教育科研水平和成果转化率却不高。您认为我国科研成果转化率不高的原因有哪些？

龚克：有一种说法，我们已经是论文大国了，但还不是创新大国，这个观点是对的，但是不能把论文和创新对立起来。不要因为我们现在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就把我们科技论文的增长、在技术研究上的活跃看作是无用的东西；不要因为暂时还没有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特别大的作用，就简单地否定我们开展的基础研究，特别要注意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在科技成果转化的时候，我国每年的奖励很多，但企业却觉得新技术对它的供给非常不足。这里面的问题表现在哪儿呢？第一，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科技的供给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来自于技术引进，特别是海外的引进。为什么这么多山寨，因为企业看这个东西做得比较好就把它学过来了，学过来以后就创造了经济效益，这是一个比较快速、低成本的发展路子，这符合企业发展的规律，当然里面有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但从企业减少成本、扩大利润的发展规律来讲是有根本的经济驱动力的。如果这时候不是做仿制，而是自己做研发的话走的是高成本路线，虽然可以说提高了自主创新能力等等，但是从短期来看成本是很高的，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在十几年前，我们提出来企业要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但他得有这样的认识才行。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企业立足自主来获得技术供给，这样的需求还不是特别旺盛。

第二，我们现在的研究机构高校也好、科学院也好，更多的是国家投入，而国家投入的重头并不在基础研究上，而是在高技术研究上，我们希望通过国家投入破解共性的高技术来带动整个企业的发展。我们现在形成的高技术积累还不够，再加上一直是政府主导，而不是市场主导，所以高技术研发面向未来高技术市场的程度还不够，因为我们的问题是学者提出来的，而不是有前瞻性的企业提出来的，我们企业提出来的往往才是现实且急迫的问题。

从全世界来看往往独立的面向市场的一些公司，是由针对市场的分析以及对技术真正了解的人在做，我们很少有类似这样的公司。我们更多的是所有专家开会，更大的专家筛小专家提出的建议，并没有和市场结合起来。而且目前我们的企业往往因为长期跟踪发展，前瞻性不太够。但是毕竟我们改革开放还不到40年的时间，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也不要过于着急，采取措施去转化没有问题，但是不能一旦重视就特别急，恨不得明年就要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下，要抛弃一些特别短视和着急的思路，至少发展科技、发展教育不能急功近利。

我们现在最根本的问题是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不足。现在上大学不是不难，还是

难，难在上好大学难，好大学供给太不足了。以中国的人口，以中国要变成创新型国家的需求，以中国重视教育的传统，中国得有300所比较好的学校，没有这些不行。

在美国，哈佛、耶鲁是最好的学校，但是和这两所差不多的学校有一大批，我们就太少了。所以我们国家应该下很大的决心来提高我们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供给，而且这方面我觉得真是不够。比如211的100多所学校招生大约50多万，占900万考生的6%，这怎么能行？如果我们能覆盖到20%会大大地缓解，这是一个很紧迫的任务。如果十年以后还是这个状况的话就会变得更难办，现在一定要呼吁我们的政府，从现在必须赶紧做工作，十年、二十年，要有一个很大的改观。

校长毕业致辞不容易，给新生的一封信会继续

思客：每年到这个时候，高校校长毕业致辞可能都会引起非常高的关注。关于南开的毕业典礼，方便透露点什么吗？

龚克：我们在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不是对媒体讲的，不是说什么话红就讲什么，我们还是要根据学校的情况，怎么能够针对学生的一些实际，讲一些让他们听了以后能够引起思考的话。今年我们要在一个校区把本科和硕士毕业典礼放在一起，这对我是特大的挑战，这个话特难讲，因为有些对本科生讲的话硕士生听了没感觉，怎么能找到这个共同点，而且说的还希望真得能够引起他们的一些思考，还真是不太容易，正想呢。

思客：今年南开的新生还会收到校长的信吗？今年这封信，您将会写什么？

龚克：信是我们的传统，每年要给新生写一封信。我们提醒他入学做一点什么准备，为大学学习、更顺利地适应大学生活，这几年写的信侧重点在这儿，利用入学前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能够更好地为大学生活做准备，我们大体上朝着这个方向写。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努力将南开办得更好一点。

（来源：新华网 2016-6-27）

重视本科教育：一流大学成熟的标志

近些年来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恐怕就是一流大学以及由此“衍生”的大学排行榜。2015年10月，国务院颁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文件，一流学科又进入了大学人的视野，并且其重要性似乎开始超越一流大学的概念。从关注一流大学转向一流学科，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由于大学在社会组织体系中的独特性，仅仅强调一流大学或一流学科还远远不够，或者说只是从一流学科的角度解读和建设一流大学，只能表明一流大学的建设还“在路上”，依然保留着明显的“急功近利”的痕迹。因为在大学的各种使命中，只有一项任务不能被社会其他组织所取代：那就是本科教育。因此，在“双一流”建设前行中，



如果缺失了一流本科教育，就很难说是一流大学，更难说是成熟的一流大学。这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共识。

一、一个案例引发的反思

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大学都发韧于本科教育，本科教育是大学的根。但在大学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大学职能的不断增加，本科教育作为大学的根，出现了根基动摇的现象。尤其是在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时代以来，在社会外部的压力下，以“科研为导向”的大学发展思路日趋盛行，大学的发展轨迹开始“跑偏”。

为什么这么说？请看下面的案例。前不久，在国内某大学听美国杜肯大学伯隆教授讲座，他的报告有这样一段开场白：“请各位看我的PPT第一页，上面是美国著名的十所大学，如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这些大学有一个最主要的、共同的优点，请大家猜一猜是什么？”台下的老师们七嘴八舌地回答起来。

“都是世界最有名的大学”，教授摇头；“科研水平都比较高”，教授又摇头；“都很国际化”，教授继续摇头；“历史都很悠久”，教授还是摇头；“拥有最好的学生”，教授有些叹气；“都是私立的”，教授还是不吐口；“都很有钱”，教授看来有些绝望了……。最后，只好由伯隆教授自己回答。他说：“这些学校最主要的共同点就是拥有最好的本科教育，都非常重视教学。一个大学对待教学和本科教育的态度，标志了其成熟水平。”伯隆教授的回答超出了大多数听众的想象。

之所以出现此种现象，说到底，还是我们对一流大学的理解有偏差。今天，大多数人对一流大学的感知，主要来自各种排行榜以及可以统计的指标。但人们忽视了一个事实：即这些指标是一所大学经过若干年发展与建设的结果，而非一流大学的成长过程；我们看到的“光鲜亮丽”的统计数据，仅仅是一流大学的“横断面”，而不是一流大学的根基和内涵以及全部历史进程。

到底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关于这个话题在我国已有许多“高论”，恐怕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看盛行的大学排行榜。其实，还有许多更简易的方法，如一流大学是用钱“堆”起来的，哈佛大学有近400亿美元的基金。因此真要归纳一流大学的特征，还可以举出很多。诸如：一流大学的经费富可敌国，一流大学的人才富可敌国……。今天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和排行榜，早已经有人把一流大学进行了“格式化”，但被“格式化指标”遮蔽的内涵更为重要。

20多年前，国人是没有资格谈一流大学的，为什么这么说？第一次听说一流大学，大约是在1994年10月，当时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正巧当时国内一位著名大学校长在香港做演讲，大意是说在亚洲大学的排行榜上，虽然目前香港的一些大学比较靠前，但再过二三十年，大陆的大学排名一定会超过香港的大学。果然如此。今天，在世界上几个主要的大学排行榜上，都可以看到我国大学的名字，且有数量不断上升的趋势。如果单纯按照统计数据，我国大学在世界大学排行榜前200强的数量大致排



在第六位。如果说中国没有世界一流大学，恐怕排行榜都不会答应。既然在排行榜上已经有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可为什么有许多国人并不完全认可，即使在一流大学工作的人，也无法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一流大学人呢？

原因就在于我国的一流大学还有许多短板，还有许多幼稚的做法，其中之一就是忽视本科教育。这说明我国一流大学发展目标还不成熟，评价指标不成熟，管理水平不成熟，存在许多碎片化的改革等。我们的一流大学，谈论更多的是 ESI、EI、SCI 等“量化”的概念，而忽略了量化指标背后的内涵。正是这些不成熟遮蔽了我国一流大学的声誉，降低了在排行榜上的“含金量”。这也就是说，一流大学与成熟的大学不是等同的概念，从排行榜上的一流大学内化到人们思想价值认同的一流大学，这才是真正的一流大学，这才是成熟的一流大学，它是“本质的改变、思想的改变、文化的改变、价值观的转变。”

具体来说，办世界一流大学，不仅要对一流大学的各种“指标”有清晰的了解，还要对一流大学形成的根基与制度安排有切身的体会。办一流大学，不仅要看今天一流大学的各种指标，还要看这些指标生成的土壤。我们不仅要看一流大学的“横断面”指标，也要从“纵向”看一流大学的成长过程。只有把握了一所大学走过的全部道路，才有可能少走或不走弯路。我国今天冲击世界一流大学，缺乏的不是指标意识，而是缺乏办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常识，即本科教育是“大学的根与灵魂”。

二、到底什么是一流大学

从世界范围内看，一所大学之所以称得上一流大学，除了在科研上取得巨大成就之外，让世人记住这所大学更多的是学校培养的杰出校友。正如斯坦福大学报告称：“该校师生和校友创建了 2400 多家企业，组成一个斯坦福大学的学子集团，其中包括了思科、谷歌、惠普等大型企业，2008 年在‘硅谷 150 强’中创造总收入共达 2250 亿美元”。也正因为如此，世界一流大学基本上要从全球招收优秀的学生，以确保大学的内在创新活力和可持续发展。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当科研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决定大学综合实力的不是科研的竞争力，而是人才培养的竞争力，特别是本科教育。

所以，凡是世界知名大学都把本科教育作为大学发展的立校之本，不遗余力地进行本科教育改革，并把本科教育做到极致，也就出现了本科教育是“大学的灵魂”这一生动的说法。历史事实也是如此，从最早的牛津大学的学院制、导师制改革，到后来德国的科研与教学相结合；从芝加哥大学的“百科全书式”教学计划，到 1945 年《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从哈佛大学的学分制到通识教育；从 1988 年博耶的《美国大学教育：现状、经验、问题及对策》到 1998 年、2001 年的《重建本科教育：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蓝图》，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许多熟知的一流大学，之所以在历史上能够引领未来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原因在于他们在很多方面致力于本科教育改革，聚焦在人才培养。即便是今天，世界一流大学在取得卓越科研成就的同时，仍能够以其独特改革引



领世界发展潮流。从近年来的MOOCs、创新创业教育再到最近哈佛大学发布的《扭转浪潮——通过大学招生激发对他人和公共利益的关注》的报告，这些改革无一离开本科教育。从这一意义上说，重视本科教育，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或者说一流大学成熟的重要标志就是看其本科教育如何引领世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潮流。

但是，在比较中外高等教育发展时，我们时常会感到，无论在观念、价值判断或者实践层面都存在落差或差异。如就大学质量保障而言，2015年厦门大学参加了联合国大学IQA (Internal Quality Assurance) 项目，这是代表中国乃至东亚的唯一一所高校。厦门大学在第一轮评估拿到全优之后，十年来坚持不懈地抓本科教育质量，可以说厦门大学是中国高校内部质量保障建设的典型示范。但是，当参加了联合国这一项目之后，我们发现双方对于质量概念的理解，存在着不同的语境。国际上对于质量的关注不仅在人力、财力、物力投入，而且已经转向于学生学习经历、学习获得感。这种质量保障体系不仅看学校在质量保障上做了什么，而且要看师生参与程度如何，其效果如何。可以说，国外大学对于质量保障已经进入一个标准化、精细化阶段，对于质量的关注已经从传统技术标准进入到一个更为深层的质量文化层面。相反，国内大学对于质量保障还处于粗放式管理阶段。举个例子，近年来随着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不断深入，国外在大学组织架构方面已经出现了教师发展中心、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健康服务中心等专业化服务组织，相反，尽管国内大学多年来一直喊“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但至少在大学组织制度建设方面并没有发生一些根本性的变化。

再如，关于大学最为基本的课堂教学方面的理念与实施建设，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来厦门大学考察合作办学时，向学校问了几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是否有学生作业查重？是否有“智慧黑板”（smart board）？是否有“学习互动器”（clicker）？是否能够提供残疾人上学的基础设施？不难想象，经过前面一个阶段的大建设、大投入，我国高校在硬件、软件建设方面都取得很大进步。我们时常听到有些人甚至说，现在国内大学教学条件从硬件方面与国外大学几无多大差别，甚至超过了国外大学。但事实上，中国过去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只解决了最为基本的条件保障。从其内涵建设而言，我们与国外大学的差距，不只是体现在有形的设备、空间、场地建设，还在于条件建设背后所隐藏的理念的落差。以图书馆建设为例，随着近年来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国外一流大学都在探讨21世纪学习的概念。基于这一概念，今天大学的图书馆已经变成了学生学习中心、资源中心、师生研讨中心，传统藏书功能大大弱化。但在国内，我们少有看到图书馆建设的这种理念，即便有也很少看到把这种学习概念变成一种看得见的实物形态。事实上，图书馆建设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现代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不仅影响到大学知识传播的方式，而且已经渗透到大学各种环境建设中，并悄悄地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这种改变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只要受学生欢迎的，必然会成为未来的一种发展趋势。未来的教学，不仅仅取决于教师传播知识的方式，而



更取决于教师展现知识的形式。可以说，传统大学与现代大学的区别，不仅在于制度层面，同时还在乎最为基本层面的课堂教学变革，而这种教学革新才是大学“软实力”的真正体现。其变革的不仅仅是传统教学习惯，最终改变的是学生学习方式、思考问题、探索问题以及发现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

显然，对于大学发生的这些变化，我们不能熟视无睹，更不能只关注那些量化的学科排名。相反，我们只有在一些最为基本的制度建设、最为基础的人才培养，特别是本科教育方面能够真正与国际接轨时，我们才能有底气说，我们是真正一流的大学。事实上，我们注意到，在过去的几十年，经常会看到《美国大学教育：现状、经验、问题及对策》《回归大学之道：对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反思与展望》《重建本科教育：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蓝图》《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大学教了没？——哈佛校长提出的8门课》等一系列反思大学本科教育的书，而较少看到回归科学研究、回归社会服务这样的醒省力作。这就告诉我们：在世界范围内，反思本科教育的声音一直没有断，甚至出现了呐喊，而且都是世界一流大学在反思。耐人寻味的是，30多年前乃至于更早，当我国还没有一流大学的概念时，我们的本科教育是真正的“大学的中心”，我们办出了一流的本科教育。可是当我们提出办一流大学的时候，我们的本科教育却在不断弱化，或者说在不断趋于边缘化。

基于这样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厦门大学高等教育质量协同创新中心最近组织翻译了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本科教育重建：美国研究型大学蓝图》(1998年)、《本科教育重建：博耶报告的3年回顾》(2001年)和《斯坦福大学本科教育研究报告》(2012年)，该文集选编的3份报告，两份由博耶委员会完成，一份由斯坦福大学完成。

美国博耶委员会长期关注美国一流大学的本科教育，1986年，博耶教授就组织研究团队，完成了第一本《美国大学教育：现状、经验、问题及对策》的研究报告。时隔十年之后，1998年，博耶委员会再次完成了《本科教育重建：美国研究型大学蓝图》，通过一流大学本科教育的案例研究，提出本科教育改革的十项具体改革措施：建立基于研究的学习标准；基于问题设计新生第一年学习；以一年级为基础进行教育；移除跨学科教育的障碍；联结交流技能和课程作业；创造性运用信息技术；探究式学习创造高峰体验；培养研究生助教；完善教师激励机制；营造集体氛围。

2001年，博耶委员会再次发布了《本科教育重建：博耶报告的3年回顾》。该报告从研究性学习、新生体验、构建新生基础、交流技巧、高峰体验、培养研究生助教、改革教师激励制度等7个方面概述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改革进展。与1998年的报告相比，2001年的报告更关注不同类型学生、不同学科领域的差异。关注研究性学习，关注本科生研究和创新活动，特别是人文社科学生的参与。报告再次呼吁增加研究性学习的机会，使其成为本科生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强调院系这一基层学术组织在本科教育改革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鼓励有经验的教师、退休教师、高年级或

研究生助教，帮助制定本科生学习项目计划，开展复合型研讨会，进行合作学习，增加新生体验，提高其写作和口语交际能力。

2012年，《斯坦福大学本科教育研究报告》发表，该报告通过对斯坦福大学本科教育现状的调查，吸收借鉴正在进行教学改革的其他大学的知识和经验，有针对性地提出斯坦福大学本科教育问题的解决之道。报告指出，斯坦福大学的教育目的在于培养真正受过教育的公民，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实现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的纵深和横向联系；培养写作、口语交际、定量技能、批判性思维、信息素养等技能，最终养成自我支持能力实现终身学习；培养个体和社会责任；培养适应性学习能力。为更好实现上述教育目标，斯坦福大学通过调整课程设置，进行教学改革，加强住宿制服务，建立与五个领域能力匹配的评估制度等改革创新一流本科教育。

以上3篇研究报告透视出强烈的信号：重视本科教育质量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核心，一流大学具有重建本科教育的引领作用。当各国的一流大学在集体反思本科教育的时候，我国的一流大学更需要反思本科教育，更需要对本科教育的弱化预警，更需要重建本科教育。事实上，我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表面上看是科学的研究的差距，其实是人才培养方面的差距。2014年，国内某“985工程”高校完成两份研究报告，全方位比较了该校与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和台湾大学的发展数据。该报告展示的数据是：尽管该校的各种科研指标与上述两所大学接近，但该所大学几乎是3位教师科研贡献率才抵得上伯克利一位教师的贡献率。这也就是说，我国大学在排行榜上的位次提升，与我国大学教师队伍的规模有极大的关系。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还是我们的人才培养有问题。因此，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还是要在人才培养上下功夫。

从一流大学走向成熟的大学需要时间，需要模仿，需要常识，更需要有自己的价值判断。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曾说：“一所大学的成熟至少需要200年”，英国的牛津、剑桥大学用了近800年，美国的哈佛、耶鲁大学用了300余年。面对一流大学的目标，显然我们有些等不及了，或者已经有“时不我待”的感觉。在此压力下，直视问题，找出软肋，补上短板，应该是建设一流大学、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策略。只要充分认识一流大学走向成熟的路径，我国一流大学的成熟也许不必要完全走西方的路。成熟的一流大学就像齐白石的水墨画，着墨的地方是画，留白的地方也是画；大学需要“养”，其培育过程如同“把玩”，这是我对大学走向成熟的粗浅认识。

三、如何重视本科教育

在世界范围内，自从科学的研究和研究生教育进入大学以来，本科教育就一直被科学的研究和研究生教育“挤压”，本科教育出现了“失落”现象。也正由于此，一些有识之士不断呼吁“重视本科教育”“回归本科教育”，这已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普遍现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正面临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转型，一系列的转型对

高素质人才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但是，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起步晚，对一流大学的认识和了解比较滞后，我国的本科教育诸多方面也需要重建，其中包含了教育理念、教学观念的重建，教学空间、教学技术、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的重建。这些重建背后的实质就是要回答两个最为基本的命题：“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培养人”。

自大学产生以来，在世界范围以及特定的社会转型时期，都会有学者从多方面反思大学的本科教育和人才培养。2008年，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威廉·德雷谢维奇(William Deresiewicz)写了一篇《精英教育的劣势》(The Disadvantage of an Elite Education)的文章，首次对美国一流大学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深刻反思。2014年，德雷谢维奇教授又出版了《优秀的绵羊》(Excellent Sheep: The Miseducation of the American Elite and the Way to a Meaningful Life)。该著作一经问世，就迅速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广泛讨论。因为作者提出了一个似乎令人难以接受的判断，作者认为：“当前的美国精英教育已经陷入了误区，这套系统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大都聪明，有天分，斗志昂扬，但同时又充满焦虑、胆小怕事，对未来一片茫然，极度缺乏目标感，他们被包裹在一个巨大的特权泡泡里，所有人都在老实巴交地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他们非常擅于解决手头的问题，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解决这些问题。”读罢该书，不由令人想起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讲的一段话：“我们的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大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当时这段话在国内引发热议，甚至令人难以接受。近期，我国有不少学者将钱理群教授提及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与德雷谢维奇在书中提及的“常春藤的绵羊”联系在一起讨论，或产生共鸣，或存有分歧，或支持，或反对，将该话题的讨论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实际上，在大学培养人的问题上，关于此类的反思乃至“批判”很多，如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60多年前所讲的“半面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1948年，梁思成先生在清华大学作了一次题为“半个人的时代”的讲座，对大学的人才培养提出了质疑。当时，梁先生是从大学文理分家导致人的发展的片面化，要求大学要培养“人格健全的人”，他提倡教育尤其是大学要走出“半个人的时代”。梁先生的观察，以及上个世纪50年代英国学者C·P·斯诺言及的“两个集团”“两种文化”等论述，都是中外学者对大学人才培养的反思与批判。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学生，这在中外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是一个持续的讨论话题。每次类似的讨论，对一国甚至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尤其是人才培养，都会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使走偏的高等教育回归到正确的轨道。

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到大众化时代，人才培养的问题更加受到关注，究竟是培养专门人才还是复合型人才，一直困扰着大学。爱因斯坦曾指出：“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



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正是基于此，“全人教育”作为一种新的人才观，以及“回归教育的本质”“回归人的教育”等新的教育理念，在世界范围开始盛行。

需要指出的是，大学中出现“驯服的绵羊”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是世界各国大学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时至今日，如何培养“高情感的”大学生仍是大学的难题。

大学该培养什么样的学生，之所以会引起人们如此大的兴趣与热议，无外乎大家对当下大学人才培养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与矛盾有质疑，对人才培养质量的担忧与不满长期积压在人们心中，在遇到这样一个话题之后得到了一个释放。但是，仅仅一味地观望、呼吁或是抱怨，是远远不够的，在对待该问题上，要理性分析背后的深层原因，并需要对我们当下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和目标进行一个清晰的、符合时代需求以及符合人才培养规律的认识和界定。如果将“驯服的绵羊”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理解为世故老道、善于利用体制谋一己私利，而将自己置身于国家命运与人类幸福之外，那么显然这样的人是不完整的，是缺乏基本人文素养和道德情怀的。不得不承认，当下由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浮躁以及大学内部存在的各种庸俗化现象，使得一些学生急功近利，缺乏自身理想和目标，导致大学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出现了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我认为，“驯服的绵羊”也好，“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罢，并不是大学生中的主流，或者说也难以成为主流。尽管如此，我们对此现象仍然需要多加关注，在学生价值观上积极引导，坚持立德树人，不仅要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操守，而且还要培养其社会担当和责任意识。

值得一提的是，在人们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驯服的绵羊”进行抨击的同时，还有一些人作为回应而呼唤大学的另一种“回归”，即憧憬过去象牙塔式的中世纪大学，向往纽曼的绅士理念和怀念洪堡的柏林大学，仰慕蔡元培主政时期的北京大学以及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进而生发出一种对大学的念旧情怀。但是事实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到来，已经冲破了理想中古典大学的边界，高等教育的地位、作用、功能以及高等教育的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美国学者弗莱克斯纳所说：“大学像其他如社会、政府、慈善等人类组织一样，处于特定时代的社会结构之中而不是之外。大学不是孤立的事物，不是老古董，不会将各种新事物拒之门外；相反，它是时代的表现，是对现在和未来都会产生影响的一种力量”。今日人们在面对高等教育中产生的问题时向来是怀念过往，痛斥今天，殊不知，理想中的古典大学已经是落日余晖，今天的大学已很难再回到古典大学时代。

毫无疑问，解决大学生的“人格分裂”问题，已经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但如何在操作层面上实现，各国都在进行有益探索。如提倡通识教育、跨学科教育、全人教育等。我认为这些理念在我国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大学所接受。尤其是通识教育和跨学科教育已经从大学边缘向主流发展，由此形成的教育范式和教学内容的变化，正日益引发世界范围内大学人才培养全面而深刻的变革。1996年，联合国在《德洛尔报告》中第一

次提出了“终身学习”这一概念。之后在《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报告，从终身学习理念提出了教育的四大支柱：学会认识、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报告提出，“除教育的直接功能之外，形成完整的人格是教育宗旨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并从全球可持续发展理念呼吁倡导教育的核心价值。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教育2030行动框架》，提出了“确保全纳、公平、有质量的教育，增进全民终身学习机会。”报告呼吁各国高等教育“除了掌握具体的工作技能，还必须重视发展高水平的认知和非认知/可迁移的技能，如问题解决技能、批判思维、创造力、团队工作技能、沟通技能以及冲突解决技能，这些技能适用于众多职业领域。”所以，从世界范围内看，无论是顶尖大学还是一般本科院校，都把通识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特别是本科教育的基本定位。

不言而喻，重视本科教育是一流大学成熟的标志，“人才培养为本，本科教育是根”这些理念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逐渐会被人们所熟知和接受。但是，怎样的本科教育算是一流的本科教育，却仍需要花相当的时间来探索。在我国高等教育早已突破精英化，并正在从大众化迈向普及化的今天，高等教育的功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我们对于大学的目标与定位却仍然沿袭着上个世纪80年代初精英教育的标准。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部积极倡导素质教育，推动了全国高校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但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历史惯性，这些教学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撼动本科教育的传统模式。所以，今天我们在讨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时，不应当忘记一流本科教育这一命题。我们需要对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进行重新的认识和界定。今天，我们的大学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关于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认为，当代大学应该培养至少具备以下素养的人才，即具有高尚道德操守的人才，具有社会担当和责任的人才，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人才以及具有跨学科背景的人才，这种目标不仅对于研究型大学适用，对于其他各类本科人才培养也同样适用。（邬大光，厦门大学副校长）

（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16年第6期）

论高校内涵发展

什么是高校内涵？高校怎样做才是内涵发展？对这些问题感到困惑并不奇怪，因为相关的政策文件大多只是提出了内涵发展的要求，但没有阐明什么是内涵，也没有指出内涵发展应当做什么。在相关的理论研究中，研究者大多只是总结了自“扩招”以来，我国高校在规模扩张、学科专业数量增长、校园扩大、基本建设扩建、师资队伍数量增加等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及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提出高校应转变发展方式，走内涵发展之路，但如何才能实现内涵发展却语焉不详。内涵发展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



题，需要理论研究做出明确的回答，更需要改革实践进行积极的探索。

一、高校发展内涵与内涵发展

内涵是逻辑学的一个概念，主要用于解释概念。概念可以从内涵和外延两个维度进行理解和阐释，内涵是内在的，外延是外在的，它们共同构成事物的性征和形态。就内涵而言，主要包括两层含意：第一，指事物的本质；第二，指事物的内容。就事物的概念而言，内涵既涉及事物的本质，又包含事物的内容。人们在概念解释的时候，有时分别从两方面去解释内涵，有时又将两方面结合起来解释事物内涵。具体选取什么方式，可根据要解释的概念及相关条件进行取舍。

高校发展有外延和内涵之别。实际上，在讨论高校发展时，除了外延发展、内涵发展两个概念外，经常使用的还有特色发展、高水平发展、转型发展等。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纵横交织，弄清楚这些关系，有助于准确把握高校发展内涵与内涵发展的含义。

（一）内涵发展与外延发展

高校内涵发展在我国的提出有一定的背景。它是从高校办学实践提出来的，从与内涵相关的外延发展的角度提出来的，是一种新的发展要求，主要针对高校发展的数量与质量要求的差异而言。简单地讲，外延发展主要指高校在数量上的增长，表现在招生规模、学科专业数量、校园面积、教学行政用房建筑面积、教职工人数等的增长上。数量的增长会不会带来内涵发展呢？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应该说，在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数量的增长并没有带来内涵发展，因为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非常短缺，规模越扩大，不管是学校数量增加还是办学规模扩大，都会稀释高等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在资源不增加的情况下，办学规模扩大将稀释高校的办学资源。由于学科专业的容量是有限的，扩大规模必须相应地增加学科专业数量。而学科专业水平的提高是需要积累的，新开办学科专业水平的提高往往不是短期内能够实现的，因此，新的学科专业数量越多，高校的办学资源，尤其是优质办学资源就越稀薄。所以，数量增长与质量提高不一定成正比，从这个角度讲，外延发展与内涵发展具有一定的矛盾性。1999年“大扩招”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主要采取了外延发展的方式，增加高校数量，扩大办学规模，新建学科专业，扩大校园面积，扩建基础设施，引进新的教职员，带来了高等教育井喷式的快速扩张，满足了数以千万计的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在规模扩张达到一定程度之后，高校发展必须发生转变。所以，从外延发展转向内涵发展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二）内涵发展与特色发展

特色是高校发展内涵的一个重要元素。特色是高校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可以是有意培育的，即高校在办学过程中有计划有组织地通过一些积极的活动和方式所追求的某种发展品位或状态；也可能是无心插柳、日积月累逐步积淀起来的，即高校在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或更久远的办学历史中呈现出来的某种发展品质，人们对其缘

起和形成过程完全是无意识的。特色发展是一种积极的发展，由于其表现为发展的品质和品位，所以，本质上是一种内涵发展。人们对特色发展的重视缘起于本科高校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教学工作水平评估要求高校陈述自身的发展特色或办学特色，很多高校在总结办学历史的同时，提出了特色发展的要求。

高校走特色发展之路，必须加强内涵建设。特色是一种好的品质，好品质本身就是一种内涵。所以，特色与内涵本质上是一致的，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特色发展也就是内涵发展。

(三) 内涵发展与高水平发展

高水平发展与内涵发展看似没有太大关系，实则是关联密切。高水平发展有两重含意：一是对发展过程的要求，二是对发展结果的要求。不论发展过程还是发展结果，要达到高水平，都离不开内涵。因此，高水平发展与内涵发展只是表达方式不同，并没有实质的差别。高校在追求规模扩张的时候，发展水平不高，内涵缺乏；转变发展方式，走内涵发展道路，就是要高水平发展，既要追求过程又要追求结果。

(四) 内涵发展与转型发展

转型发展与内涵发展的关系要更复杂一些。政策所要求的转型发展是指要建设某种类型的高校，让一部分高校办成应用科技(技术)大学。当然，某种类型的高校一定有其特殊的内涵，应用科技(技术)大学的内涵主要表现为其学科专业的应用性和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高度关联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转型发展与内涵发展是一致的。所谓转型，就是要在内涵建设上转变过来。但是，由于转型发展政策要求所有新建本科高校都要办成应用科技(技术)大学，而且部分有意愿的老本科院校也要转型发展。转变高校类型的发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内涵发展。不论是新建本科院校还是老本科高校，在其原先的类型上原本都会有一定的内涵，在转型发展要求下，原先不具有的内涵要发展，已有的内涵要转变，否则，难以实现转型发展。所以，转型发展不仅要建设新内涵，而且要改变或消除旧内涵。正因为如此，转型发展会存在风险。

概而言之，高校内涵发展是一种积极、进步的发展，意指高校功能活动及其结果品位的提升及相关要素品质的改善和优化。高校特色发展和高水平发展与内涵发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三者主要针对高校不同侧面的发展状况而言。内涵发展与外延发展是相对的，它们所指称的发展有实质性的差异，内涵发展主要针对发展品质，外延发展主要针对发展的数量。当然，任何内涵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数量基础上。内涵发展与转型发展既相联系又相区别，转型发展可能赋予高校内涵新的要素或品质，也可能存在丧失已有内涵，而新的内涵尚不成熟的风险。

二、高校内涵发展的动因

内涵发展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弱到强的过程。高校是一种社会生命组织，有其生长规律。我国高校不仅面临国内竞争，而且面临全球竞争。国内竞争不但

有高教界内部的竞争，还有高教界与社会其他产业行业的竞争。因此，高校内涵发展绝不只是高校自身的事情，而是事关整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大课题。高校内涵发展源于多方面的要求。

(一) 国家政策要求

国家政策是高等教育发展要求的反映，体现国家的意志。在国家高等教育政策文件中，内涵发展一直是有所体现的，但大多表现为提高质量的要求。内涵发展最早出现在 201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该文件提出：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树立科学的质量观，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树立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教育发展观，注重教育内涵发展，鼓励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出名师，育英才。建立以提高教育质量为导向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把教育资源配置和学校工作重点集中到强化教学环节、提高教育质量上来。制定教育质量国家标准，建立健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整体素质。这里不仅明确提出了“注重教育内涵发展”的要求，而且从学校特色水平、教育质量、资源配置、教学环节、质量保障、师资队伍等多方面进一步明确了发展要求。这里既有对高校发展方式的要求，又有对发展结果的要求。

如果说《教育规划纲要》所提出的内涵发展要求主要是政策原则的话，那么，2012 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简称“高教 30 条”)所提出的内涵式发展要求就是办学规范要求。“高教 30 条”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坚持内涵式发展。并对内涵式发展的含义进行了解释，主要包括：树立科学的高等教育发展观，牢固树立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坚持稳定规模、优化结构、强化特色、注重创新，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稳定规模，保持公办普通高校本科招生规模相对稳定，高等教育规模增量主要用于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以及扩大民办教育和合作办学。优化结构，调整学科专业、类型、层次和区域布局结构，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满足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需求。强化特色，促进高校合理定位、各展所长，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注重创新，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鼓励地方和高校大胆探索试验，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按照内涵式发展要求，完善实施高校“十二五”改革发展规划。可以说从 2010 年提出注重内涵发展，到 2012 年提出“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标志着我国高校内涵发展政策已经成熟。

(二) 社会舆论要求

社会舆论的基础是人民大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从争取有学上到争取上好学的转变，既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又反映了新时期人民大众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要求。新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让数以千万计的人获得了接



受高等教育的机会。2014年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了3559万人，在国际上是无可匹敌的，但质量却还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据统计，我国有170多万人在国外高校留学。尽管不能说所有出国留学的学生都是出于对国内高校教育质量的不满，但一年超过40万的出国留学人数也不能不引起我国高校的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社会公众期待高校在大规模办学的背景下，加强内涵发展，提高办学水平和办学质量，满足人民群众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需要。

（三）发展规律要求

高等教育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不同的发展阶段，高校要解决的发展问题有所不同。据统计，2014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37.5%，进入了大众化发展的中后期。预计到2020年左右，高等教育规模将达到4000万人左右，毛入学率可能超过50%。一般而言，当一个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0%~20%之间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快速增长时期，这个阶段社会热情高涨，生源增长快。当达到35%以后，增长速度放缓。进入大众化中后期和普及化阶段以后，高等教育规模在量的增长上会出现“滞涨”现象，进入平稳发展阶段。在国际上，在高等教育向大众化中后期、普及化阶段发展的时候，高校都十分注重内涵发展。这是高校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要求。

高校发展也有规律。高校是一种社会生命组织，它的生命周期分为创业期、中兴期和成熟期，后两个时期可以看作高校生命周期的高级阶段。在生命周期的不同时期，高校面临的发展任务是不同的。在创业期，高校的主要任务有两个方面：建基立业和建章立制。建基立业，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学科专业布局和结构建设等。建章立制，就是建立规章制度和工作流程、规范等，使学校能运转起来。进入中兴期，高校发展的重点就是充实内涵、培育特色，提高办学水平和办学质量。在内涵得到充实、特色得到彰显的时候，高校发展进入成熟期，只需常规化办学，就能做出高水平的贡献。目前，我国高校大多处在创业期向中兴期过渡或中兴期建设阶段。创业期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中兴期的任务已经提上了日程，如建章立制的问题在我国所有高校中都存在，学科专业结构问题也还比较普遍，自主办学能力还不强，部分高校的师资引进、教职工工作安排以及薪资调整还没有形成良性循环，学科专业内涵不足，教学过程的学术含量和创新性缺乏，师资队伍的素质还比较弱，等等。所以，我国高校应当在解决创业期问题的同时，关注和重视中兴期的任务，着力解决办学的内涵和特色问题。

三、高校内涵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

我国高校大都处于创业期和中兴期，存在一些内涵发展问题不足为怪。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实行统一领导管理体制，高校缺乏办学自主权，主要根据国家统一的政策和指令办学，在内涵发展问题上，不同高校之间既存在差异，又表现出显著的相似性。

（一）高校内涵发展存在的问题



我国高校内涵发展问题复杂而多样，既有理念层面的问题，又有功能结构层面的问题，同时，还有条件文化层面的问题。

1. 学科专业内涵单薄

在过去10多年里，我国高校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过程，包括学科专业的迅速增加。很多高校的办学覆盖八、九个，甚至十多个学科领域，涉及数十个专业，有的甚至上百个专业。但浏览一些高校的网站，往往显示学校只有几个重点学科、几个优势特色专业、几个重点实验室等；在学科专业带头人和各类人才的介绍中，在数以千计的师资队伍中，往往只有几个或几十个各类人才。从中显示高校学科专业的内涵是单薄的。

我国高校有一个弊端，即往往把专业知识过于狭隘地理解为某一个学科领域的知识，不涉及其他学科知识，从单一的学科角度办专业，这样就限制了专业的内涵。专业的知识应该是多学科领域的，一个专业往往以一个学科领域的知识和技术为主，同时包含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和技术。学科发展水平低，内涵少，办专业所依托的学科资源就是有限的，能够开出的课程数量非常有限，也不可能开出丰富的高水平课程，自然就出现了内涵发展不足的问题。

2. 师生员工价值观单薄

这个问题涉及高等教育理念，影响干部、教师和学生的工作和学习态度，时间、精力投入，以及工作中的成就感。在干部方面，缺少专业精神，对高等教育规律知之甚少，很少能够坚持按规律办学，政策和行政指令高于规律，一切以服从上级部门和领导为依归；在教师方面，为了满足教学工作量要求而教学，为了评职称而做科研，缺少对教育教学的忠诚，缺少对学术的敬畏，敷衍、应付、浮躁、倦怠之风盛行；在学生方面，没有真正追求知识和享受教育过程的意愿，为了拿文凭而上大学，上课是基于考试和学分的要求。有的高校甚至做出“学生可以不修课程，只要通过考试就可以获得学分”的规定。殊不知，课程的根本目的在于让学生体验教学的过程，而不仅是让学生通过考试。高校教育教学是一种学术专业活动，干部、教师和学生都要有一种专业的精神和态度，尊重教育规律，树立专业的价值观，不为权力、利益和名誉所左右，全情投入，这样的高校才是真正有内涵的，才是能够受到尊重的。

3. 教学过程内涵单薄

教学过程直接影响人才培养质量，可以说，教学过程内涵达到什么水平，就有什么质量的人才培养。教学过程的内涵表现在诸多方面，这里主要就教学方式的内涵做些分析。在我国高校课程中，讲授课占了绝大部分，甚至可以说，除了一部分实践实习课外，其他课程几乎都是讲授课。讲授课不一定没有内涵，但如果只有教师讲授，且主要是讲授教材的话，教学的内涵可能是非常有限的。我国高校教学中存在的教师教一本书，学生学一本书，考试考一本书的所谓“一本书的大学”现象。当然，重视教材无可厚非，但是，过度重视教材，甚至唯教材是瞻就会出问题。由于缺少不同课程教学的融会贯通，



学生所学内容碎片化现象严重。这样的教学可能为学生解决了“是什么”的问题，而对于“为什么”“怎么样”和“怎么办”的问题，却很少触及。这样的教学方式可能保证了最最基本的教学内涵，远远谈不上内涵丰富，谈不上高水平、高质量。

4.办学条件单薄

过去十多年里，我国高校办学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校园面积大规模扩大，教学行政用房、建筑面积成倍增加，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质量明显提高，但应该看到，这些办学条件还只能保证基本的办学需要，在很多高校，办学条件只能维持基本的教学运行需求。长期以来，因为办学条件不足，我国高校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即教师不需要办公室或工作室。教师在学校的工作就是进教室上课，学校只需给行政人员配备办公条件，教师往往只有集体用的会议室。到目前为止，没有一所大学能够为每一位教师提供办公室或工作室。如此的条件配置带来的结果就是教师上完课就离开学校，这样不仅淡化了教师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弱化了校园学术氛围，客观上造成了师生交流的困难，而且不能保证教师的工作投入。长此以往，还可能削弱教师对学校的忠诚度。

5.校园文化单薄

近年来，一些高校十分重视校园文化建设，看似热热闹闹、轰轰烈烈，实则内涵单薄，效果差强人意。不少高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上，特别重视用有警示和教育意义的字词给校园道路命名，张贴能发人思考的警句、箴言或有激励作用的名人名言，摆放和树立名石并镌刻各种励志言语。形式高度趋同，风格大体一致，所用名言警句大同小异，显示出校园文化僵化刻板，缺少内涵。校内涵发展存在

(二) 高校内涵发展存在的问题根源

对我国高校普遍存在的内涵发展问题，必须正本清源，找出造成上述问题的根源，以利对症下药，为高校走内涵发展道路创造必要条件。

1.高校组织性质异化

高校是社会的学术组织，具有学术性。与社会政府组织、企业组织不同，高校以人才培养、科学的研究和社会服务为使命，应当遵循其自身的逻辑办学。但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并不享有自主办学的地位和权力，而是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的附属机构，凡事听命于上级部门及其领导的指令。国家法律对高校办学的约束力远远小于上级部门的通知和意见，服从上级成为高校组织运行的基本逻辑。自主性的丧失和行政化倾向导致高校发展总是在追求赶上政策变化的脚步，往往一项政策还没有得到完全落实，甚至还没有完全弄明白，又要去适应新的政策，持续性、累积性不足，必然导致浅层性和零碎性。高校发展的累积性不足必然带来内涵的薄弱。

2.高等教育价值错位

高等教育是一种价值活动，人本价值、知识价值、公益价值、功利价值等充斥其中，多元价值之间必然存在矛盾和冲突。大众化发展更激化了高等教育价值冲突，加



之高校组织性质的异化，人本价值、知识价值等与高校组织的学术性相对应的价值的影响日益式微，即便人们仍然提倡人本价值和知识价值，往往也与功利价值等相联系。高等教育价值的漂移和错位，导致高等教育活动主体的价值选择错位，高等教育过程功利化、甚至空虚化倾向严重。教师不以促进学生发展为目的，不以工作进步为幸福，而是以完成工作量和拿到多少课酬为最高追求；学生的学习不以个人的认知、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发展为目的，而是以通过考试、取得学分、拿到学位为根本目标。“酱油课”盛行，翘课成为常态，教师和学生价值的现实化、功利化和形式化导致高等教育过程徒有其表，尽管各环节的工作都在按部就班地开展，但却充满了应付现象，缺少了智慧的灵动，更缺少心灵的对话与碰撞，马克思所说的教育应当是“人格心灵的唤醒”难觅踪影。这样的高等教育过程是没有内涵的，即便有，也微乎其微。

3. 高校发展模式落后

高校内部权力集中，校级领导大权独揽，尤其是主要领导几乎是独断专行。办学讲究统一性，全校一盘棋，全然不顾各学科专业的特点和发展要求，更不考虑各学科专业教师的感受。学校和部门领导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只顾眼前，疲于应付各种会议和检查督导，对于涉及长远发展的战略性问题想不到，即便想到了，也少有想明白的。这样的发展模式不可能带来丰富而充实的内涵，也不可能提升已有内涵的品味。

4. 高校办学资源严重不足

办学经费不足是我国高校办学面临主要难题之一，经费不足造成高校办学资源短缺。高校内涵发展是需要代价和成本的，粗放式发展、外延式发展所需要的成本相对较低，内涵发展的成本是高昂的。在高校科研中，有什么水平的仪器设备，就可能做出什么水平的研究成果；在高校教学中，学生接触了什么样的仪器设备和学习环境，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很多高校办学资源只能满足基本的发展需要，因陋就简，维持运行，难以丰富和充实学校发展内涵。

四、高校内涵发展的策略

毫无疑问，内涵发展是我国高校实现向生命周期的高级阶段过渡的必然选择。尽管各高校的校情千差万别，发展要求和目标各不相同，但在内涵发展的策略上，仍有一些共同的路径可以遵循。

1. 落实高校自主办学地位

自主办学是高校内涵发展的前提条件。自主办学问题已讨论了 30 多年，但高校办学实践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问题的症结在于高校与政府部门之间的隶属关系没有突破。政府天然地认为各级各类高校是其直接管辖的单位。不转变这种管理方式，高校的自主办学地位不可能真正得到落实。加强党委和政府对高等教育事业的宏观管理，建立管办评分离的新的治理体系，还高校应有的办学自主权，使高校能够自主地选择发展方式，能够自主地安排发展工作。有了自主办学地位，高校还应当做好发展



的顶层设计，明确长远发展要求和阶段性发展目标，按照所规划的发展路线图，坚持内涵发展不动摇，实现累积性的高水平发展。

2.以改革促进内涵发展

改革体制机制和习惯传统，释放内涵发展潜力，是高校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也是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要求。很多高校已经或正在制定综合改革方案，需要注意的是，不能为改革而改革，要针对制约高校内涵发展的体制机制和习惯传统，紧紧围绕提高发展水平和质量的要求，积极而审慎地推进综合改革。尽管很多高校都将综合改革的突破口确定在人事制度改革，但人事制度改革不是目的，综合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提高科学的研究的水平，提高社会服务的效益。这些都属于高校内涵发展的范畴。因此，可以说，综合改革实际上是内涵发展的要求。

3.转变发展模式

高校要转变指令发展模式和经验发展模式，大胆采用战略发展和规划发展模式，从根本上扭转低效率办学、低水平办学、低积累办学和无特色办学的局面，走上内涵发展的快车道。高校战略发展的关键在于确立发展战略，很多高校都制定了所谓的学科战略、教学战略、科研战略、人才战略、质量战略、文化战略等，其实，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都不能称为战略，充其量只是一些排比句或对仗的口号。制定战略，必须进行战略研究，明确高校发展的愿景、目标和重大行动，将三者有机统一起来，方能形成有内涵的发展战略。

4.加强教学过程内涵建设

人才培养是高校的首要功能，人才培养的内涵发展是高校内涵发展的根本所在。加强教学过程内涵建设，必须转变教师的教学行为和学生的学习行为，使学生成为教学的中心，将教学过程打造成为学生在教师的组织和指导下的自主学习。这种教学的内涵远远超出了“一本书的大学”的教学过程，在这样的教学中，学生不仅能学会“是什么”，而且还能学会“为什么”“怎么样”和“怎么做”。更为重要的是，学生所学会的东西，不仅有从教师那里学会的，更有自己主动学到的。这种学习不仅有听讲、看书，更有实践和体验；既有个别化的自学，更有规模不等、形式各异、要求不同的团队学习；既有师生之间的交流沟通，更有同学之间多种多样的深层互动与交流；既有课堂的学习，还可能有走出校门，在社会和企业生产情境中的学习。形成了这样的教学过程，高校人才培养功能才能落实，内涵发展才能实现。

5.培育宁静的校园文化

高校校园是其功能发挥的策源地，校园文化则是孕育功能的土壤。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化，就有什么样的高校功能。我国高校校园文化表现出浮躁性，总是在迎合从社会渗透进来的某些东西，缺少基于自身价值的选择。校园文化不同于市井文化，更不同于市场文化，当然也不同于官场文化，高校本应是高尚的、深沉的、宁静的，是能



够让人放下一切俗务，潜心于人才培养、科学的研究的。

6.高校领导应当坚定不移地推动内涵发展

高校领导是影响学校发展方式的关键人物，尤其是党政主要领导，更是高校发展方式的风向标。尽管我国高校正在努力建设治理结构，但党政领导在高校的地位和作用仍是不可替代的。推进高校内涵发展的责任主要在领导，领导不但应当自己身体力行，还应当把全校干部、教师和学生动员起来，全员参与到内涵发展中去。推进高校内涵发展，领导应当坚信不疑，坚定不移，在学校重大决策中、在日常行政工作中，自觉地从内涵发展的要求出发，谨言慎行，探索内涵发展的新模式。应当加强学习和研究，不断丰富和完善内涵发展思想和方法，不仅要懂得为什么要内涵发展，而且要懂得怎么实现内涵发展，还要懂得在学校发展的不同阶段内涵发展的不同要求是什么，用思想引领行动，用理论指导学校发展。

（作者：别敦荣，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本文根据作者2015年10月16日在山东省高校领导干部培训班上的报告整理而成。）

（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16年第5期）

终止高等教育“985”“211”工程，纳入“两个一流”建设

从“大者通吃”走向“特色取胜”

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办学绩效”为杠杆

教育部日前宣布失效一批规范性文件，其中包括《关于继续实施“985工程”建设项目的意见》《关于补充高等教育“211工程”三期建设规划的通知》《关于实施“重点特色学科项目”的意见》《关于继续实施“优秀学科创新平台”建设的意见》等文件。对此，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举是对新时期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做出的新部署，要将“985工程”“211工程”等重点建设项目，统一纳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该负责人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以及创新驱动发展等重大战略，对高水平大学建设提出了更高、更迫切的要求。2015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5次会议审议通过《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11月，国务院正式印发，对新时期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做出新部署，将“985工程”“211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特色重点学科建设”等重点建设项目，统一纳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要求贯彻全面深化改革要求，创新重点建设机制，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目前，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正研究制定实施办法和配套政策，拟于今年启动新一轮建设。

针对于此，记者与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教室主任马陆亭和云南大学高教研究院教授罗志敏进行了深度对话。

记者：为什么终止“985”“211”工程，这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怎样的发展阶段？

马陆亭：首先要说明的是，“985”“211”工程等都属于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有增有减是正常现象，这是由国家财政预算体制决定的。

终止的时代背景是项目、称号出现了固化，导致竞争力、活力、示范性减弱，影响项目效益的发挥。新中国成立以来，重点建设模式一直是我国高等学校建设的一大政策路径，从全国重点高校到“211”和“985”建设，在思路上一以贯之，而到“2011计划”开始有所调整，是为了去除“千校一面”、封闭固化的弊端。我认为，此次国家将“985”“211”工程统一纳入“两个一流”建设的目的，与前者相同。

记者：“985”“211”工程在中国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进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马陆亭：“985”“211”不仅提升了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实力，而且也使一批高水平大学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名校。可以说，过去重点建设项目的积累，为我们今天开展“两个一流”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记者：如何评价“985”“211”工程的得与失？

罗志敏：“985”“211”工程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我国高等教育影响最深远的两项政策。应该说，在当时我国急于追赶世界高等教育先进水平、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但资源非常有限、经费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实行以政府对高校进行“身份认定”为基本特征的“985”“211”工程，很有必要。政府通过强有力的“国家意志”，以“中心—外围”的大推进战略，集中有限的资源，人为扶持少部分高校，通过一部分高校的快速发展，进而带动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985”“211”工程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随之凸显。其一，它导致国家高等教育系统形成了难以改变的“差序格局”。这使得不同区域的高等教育、不同大学之间的“马太效应”越来越明显。其最终的结果是，那些处在高等教育系统顶端的大学永远没有被后者赶超的后顾之忧，而处在低端的地方高校则几乎没有可能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处境。其二，弱化了高等教育市场竞争。“985”“211”大学是在一轮又一轮项目认定的基础上，通过“资源配置的剪刀差”形成的，而非通过学术、教学上的相互竞争。其三，高校依附政府的倾向非常明显，使得高校缺乏组织变革和制度创新的勇气和意愿。

记者：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是调整结构、提升质量，在这一目标下，我们需要怎样的新一期国家工程，以带动高等教育的良性发展？

马陆亭：去年，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了确切的时间表，包括三个阶段的具体建设目标和五年一轮的建设周期。阶段目



标在时间段、内容项上既是递进，又是并进的——既存在从行列到前列、从少到多的递进，又存在大学、学科和高等教育整体实力的并进。量变引发质变，最后形成“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的局面。这说明，“两个一流”建设既瞄准高端，又对梯队有引领和带动作用，最终是为了实现高等教育强国战略。这也有助于引导各高校寻求自己的办学目标，鼓励和支持差别化发展。

记者：当前，“两个一流”建设的核心工作是什么？将给我国高等教育整体腾飞带来哪些影响？

罗志敏：“两个一流”建设的核心工作，应该包括以下两个层面：第一，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学科建设要面向国民经济发展需求，坚持特色发展战略，培养优秀人才。第二，以“办学绩效”为杠杆。要突出绩效导向，建立健全绩效评价机制和动态调整机制。要积极采用第三方评价，同时在资金分配方面更多考虑办学质量，特别是学科水平和办学特色。

这一政策要得到有效推行，其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多方面的。我们将从“以校为王”走向“以学科为王”。如今后的高校招生，一所“985”高校整体的录取分数线很可能还要低于一所普通院校强势学科的录取分数线。同时，我们或将从“大者通吃”走向“特色取胜”。如在办学经费方面，一所综合性大学所获得的国家财政经费支持很可能还赶不上一所单科性院校。

(来源：《光明日报》2016-6-30)



他山之石

南开大学：“教学优先”的定位与探索

一、“教学优先”：教学在学校整体工作中的定位

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是国内外研究型大学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只能是长期处于不平衡、调整、再调整的过程之中。

就研究型大学的教师群体而言，同时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占大部分，教学和科研都很好或比较好的也占大多数。但确实有一部分教师，课讲得好但科研偏弱，或科研好但教学效果偏差，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这个基本面要肯定。制约教师教学质量的主要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教师教学精力投入问题；制约学校整体教学工作效果的，也主要不是体制因素和重视程度的问题，而是管理水平和激励手段尚不到位的问题。同时，也要注意，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我们要向教师明确地发出必须切实提升教学水平的信号，一方面研究型大学的教学应当是“内容导向”的和有足够科研含量的，避免用高中教师、党干校教师和师范类院校教师的教学标准来要求研究型大学的教师。

学校对教师的科研要求很高，政府和社会对教师的科研期望很高，教师的科研压力很大。以南开大学的文科为例，1000位教师，900位有课题，人均纵向和横向课题2个左右，这还不包括校内课题、临时性课题、自选课题。在研究型大学，“轻教学”是不对的，但“重科研”不能说是不对的。高水平的科研，是高水平教学的保障和支撑。这个基本面也要肯定。

所以，学校的整体发展，要求实现其主要职能有重点但相对平衡的组合，也要与教师自身职业发展思路相契合。至于相当一部分教师对教学工作精力投入不足等问题，其原因有自身职业生涯规划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制度设计和工作安排的问题。因此，在组织教学运行与组织科研运行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研究型大学教师群体的特点，不能简单采取“拉锯”的形式，关键是要采取切实有效的保障措施，使教师能够协调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实现精力的合理分配。

对于教师，要从入职培训开始，强化他们对“教师”这一职业的身份认同。对于在学校占大多数的教学科研型教师，学校要从他们的实际出发，从学校的实际出发，在教学模式、教学组织运行、工作考核等方面，采取切合实际的措施，调动他们的潜力，使教师能够同时做好教学与科研工作，达到教学与科研的相互促进。对于科研好而教学一般的教师，要鼓励和加以引导，并开展相关培训，在教学组织安排中，量体裁衣，选择合适的方式，发挥其优势。对于教学好而科研一般的教师，也要给予支持和鼓励，有他们的发展通道，同时帮助其融入相应的科研团队，提升科研能力。研究



型大学首先是大学，要努力做到教学优先，教学科研相辅相成，两翼齐飞，进而促进大学的人才培养工作。

2007年，南开大学为迎接本科教学评估而举行的本科教学改革大讨论中，有教师提出了“教学神圣”的理念。学校对此予以积极肯定，以在精神层面激励教师做好“师”者工作，但在运行中发现，“教学神圣”的提法还需要实现具象化。2011年，学校围绕制定《南开大学素质教育实施纲要(2011—2015年)》(以下简称《素质教育纲要》)，开展了素质教育大讨论。在总结南开大学育人传统的基础上，提出教学要紧密围绕培养公能兼备的人才，推进素质教育。为此，学校着力推动“三个转变”：在办学观念上从“学科为本”转变为“学生为本”，在教育内容上从侧重“传授知识”转变为重在“提升素质”，在培养模式上从“以教为主”转变为“以学为主、教学相长”。在此基础上，《素质教育纲要》提出了“完善‘教学优先’的教学保障机制”概念，强调在制度上、运行中确保教学始终具有优先地位，即教学是校院管理层“最优先”考虑的工作；在包括教学、科研等学校的所有工作中，当需要安排工作落实顺序、决定项目取舍、确定倾斜方向时，要确保教学工作，特别是本科教学工作处于优先“被保障”的地位。2014年，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学校坚持教学优先”的提法，被载入《南开大学章程》。

二、在“教学优先”定位下围绕素质教育所做的一些探索

近年来，学校在“教学优先”的定位下，组织开展学校各项工作，努力处理好学校科研发展与人才培养的关系，努力处理好教师精力在教学和科研之间的平衡问题，取得了一定成效。

1. 改革教学组织方式，变“三二一”为“一二三”。为了给学生提供更大的自主学习、自我成长的空间，学校积极改革传统的“讲三练二考一”的教学组织方式，鼓励教师朝着“讲一练二考三”方向组织课程，进行教学改革。

在“三二一”模式下，教师往往忽略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而是习惯于在课堂讲授环节多讲、细讲，追求知识点的全覆盖，将过多的精力放在讲授内容上。考试环节则采取“考重点”方式，期末一张卷子决定学生的成绩。学生也认为掌握了教师讲授的内容，就能够顺利完成课程目标，考取一个不错的分数，因而主动学习意识不强，深度学习、拓展学习的意愿也不足。

在“一二三”模式下，教师将课堂讲授调整为精讲，内容精炼、重点突出；通过布置作业，提出开放式问题，让学生课下自主查阅资料，整理文献，积极思考与讨论；在考核环节采取过程考核与结课考核相结合的方式，注重学生学习全过程的投入程度与学习效果，鼓励考题有较宽的覆盖面，全面检验学生课内外整体学习效果的状态，也能保证学习结果的区分度。

“一二三”的教学组织方式，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主动拓宽学习视野，也为学生创造了更多充分发挥才能的空间。考试不仅能够检验学生的课堂学习效果，同时也能考核其自主学习能力和真实水平。教师通过实施“讲一练二考三”，也促进了课堂教学方法改革，增强了课上师生交流互动、讨论，引导教师加强教学研究，改革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提高教学质量。同时，这也为鼓励教授特别是知名教授给本科生授课创造了条件。一定情况下，教师们可以不用准备一个完整的全学期课程，而是讲授重点内容，引入自身科研成果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针对科学问题主动学习、主动探究。

2. 搭建合理的人才培养结构。不可否认的是，学生群体在学习过程中，因为个人志趣、现实因素等，将来会选择不同的道路，有的学生会选择工作，有的学生会选择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对于不同层面的学生，学校应该采取有针对性的培养措施，帮助他们顺利实现阶段目标。因此，南开大学本科生培养按照金字塔型结构实施针对性培养，其中拔尖类人才约占8%，特色类人才约占12%，学科基地人才约占30%。

“8、12、30、50”的学生培养结构中，数、理、化、生理科伯苓班以及将要推出的人文、社科、经济伯苓班，这部分学生占学生总体的8%，作为拔尖人才培养，此部分学生将来的培养方向就是专业的学术型人才；与天津大学联合办学的分子科学与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两个专业，互开的金融、工商管理双学位班，以及我校经管法复合型人才培养试点班、信息安全法学双学位试点班、金融数学双学位班，这部分学生约占全校学生的12%，作为特色人才培养；另外的30%，依托文理科基地进行培养。余下的50%，进行正常培养。金字塔状的培养结构，有助于围绕培养目标，针对学生特点，分层组织与开展教学和培养工作，也有助于充分且有效地利用研究型大学的师资与科研资源的优势，帮助学生在确立方向后获得较为充分的学习与发展机会。

3. 打造素质教育核心课程。学校在《素质教育纲要》中提出了“将校级公共必修课程作为面向全体学生的核心课程进行建设，完善管理模式，稳定教学团队，增强教学效果”的规划。从2000年开始，学校对大学数学、公共英语、计算机、大学物理、大学语文、思政类、体育类等公共必修课程投入大额专项经费，并随着教学情况的变化及现代化信息手段的发展，进行了多轮改革与建设工作，获得了较好的成果。全校的14门公共必修课中，大学语文等6门是国家级精品课，2门是市级精品课，4门是校级示范精品课，整体“精品课率”达到86%。

全面精品版的公共必修课程，能够保证南开大学所培养的学生具有较扎实的基础知识，也能有效保证基本的本科生培养质量，并对通识教育目的有效达成起积极作用，为学生的后续学习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4. 不问英雄出处的“魅力课堂”。传统上的教学奖项，虽然关注的重点是教师的教学工作，但在评比时仍将教师的科研水平作为一个衡量指标。又因为教学工作难



以衡量，很多时候，特别是在参评者教学工作区分度不大的情况下，评选过程仍然会将科研水平、科研项目主持承担情况视作一个重要指标。

学校推出的“魅力课堂”评选工作，是以提高课程教学质量为目标，评选出在本科课堂教学中深受学生欢迎、教学热情高、教学效果好的一线教师。“魅力课堂”的评选完全依据教师的教学风采与课堂教学效果，淡化科研水平、资历、职称职务等条件，代表了学校课程的现时较高水准。

“魅力课堂”的评选要求参评教师连续两年并正在独立承担一门本科课程，近3年无教学事故的在职专任教师，且长期从事基础课程教学的教师优先。学院通过教师自愿申报、专家听课、学生评议，综合后确定推荐人选，再由教务处组织专家随堂听课，并就教师网上评教情况报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审议。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对各单位推荐人选进行集体评议，确定入围名单。此项奖励记入教师个人档案，并在今后教学项目的申报、职称评聘等环节中给予政策倾斜。同时，通过校内外媒体对获奖教师进行宣传，使之起到示范带动作用。目前，学校已完成了两届“魅力课堂”评选工作，共20位教师获“魅力课堂”奖，另有9位教师获“魅力课堂”提名奖。在29位获奖者中，青年教师为11位，占38%；副教授和讲师为15人，比例过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位33岁讲师获得了第一届“魅力课堂”奖。“魅力课堂”的评选较之以前的各种评比、奖励，在年龄和职称的构成方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也达到了设置这个奖项的预期目的。这项活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教师创新课堂教学模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教师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提高自己展示度的机会，特别是为教学型教师的脱颖而出提供了一条新的通道。

5. 推出南开大学教育教学奖励办法。针对研究型大学部分教师中“轻教学”的现象，2015年学校出台了《南开大学教育教学奖励办法》，此举在教师群体中引起较大反响，鼓舞了教师投身教学和人才培养的热情，也体现了“教学优先”的思路。奖励对象为在南开大学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集体或个人。奖项设：教学建设优秀奖，包含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评出的教学团队，各级各类品牌课，各级教材奖，教改优秀项目，魅力课堂；优秀实践教育教学奖包含实验教学技术成果，指导学生参加课外创新、实践、实习、竞赛等获奖；教育教学竞赛优秀奖包含由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部门主持评选的各类教育教学竞赛奖，优秀教学数字资源、优秀教学研究论文等；教育教学管理奖包含由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部门评选的各类教育教学管理优秀单位或个人，良师益友奖等。

推出教育教学奖励办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部分教师将个人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的问题，对于教学为主型教师，特别是基础教学的教师，给予一定的物质激励，是一种对其教学付出的肯定，也有助于促进他们继续投身教学工作，进行教学建设和教学改革的热情。同时，对于科研为主型教师也有助于引导他们适当地将一部分精力

投在教学工作中。这样，促进了教师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主动平衡好自身教学与科研工作的关系。

6. 本科生创新科研“百项工程”。2002年，学校在原本开放实验的基础上，搭建了面向本科生的创新科研“百项工程”平台。“百项工程”在激发学生创新意识，培养创新能力、合作能力、实践能力等方面进行了有效地探索，并且在2005年的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选中荣获一等奖。“百项工程”由学生自主选题，自主组队，自主联系指导教师，所立项目由最初不到80项增长到现在的每年500余项，每届2/3的学生参与其中，目前已累计达到4000多项，投入总经费近2000万元。一些学生作为第一作者在国内外顶级刊物上发表了论文，还有很多同学的成果获得了专利。

“百项工程”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培养创新能力和展现自己才华的舞台，得到了师生的广泛认同与支持，尤其深受来访的国外专家学者的好评，认为走对了路子。近年来，也有很多教师主动把自己的选题纳入“百项工程”中，“自费”参与进来指导学生进行科学研究。学生通过“百项工程”等科研项目的训练，能够将课堂知识与实践相结合解决具体问题，激发他们对相关知识探索的兴趣，养成勤于思考和动手的习惯，促使学生自主学习和能力提升，得到了在一个研究型大学应有的科研训练。

7. 对课堂、考试全覆盖的教学督导。南开大学采取校、院两级督导形式，注重教学过程管理，实现了对课程的全覆盖。每学期开学初，校领导、部处长、学院的领导班子、教学督导、学生，不同群体都深入到教学一线，进行巡查。学校也利用校领导巡查走访工作，了解一线教学情况，汇总整理后再责成各相关单位解决。2014年，各级督导巡视考场5000余场人次，并首次开展了对毕业设计(论文)答辩过程的巡视工作。

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各级督导的作用。学校定期开展专项督导，开展随堂听课，督查教师授课情况，通过试卷成绩检查试卷规范情况，考察试卷水平是否能够体现课程要求，所给的成绩分数是否合理等。学生信息员队伍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将学生群体眼中的教学问题反馈给学校、学院，由学校、学院进行甄别与改进。各级督导体系的工作，保证了学校教学工作的规范，也让学院、教师在一定程度上认真对待教学工作，关心教学工作。这是学校本科教学能够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的有效保障。

8. 率先推出毕业校友课程评价系统。2016年，南开大学在传统的督导体系下，又增加了毕业校友的课程评价。学校开发了基于微信平台的课程评价系统，该评课系统主要面向南开大学本科2007—2011级的毕业校友，邀请毕业学生对本科时上过的课程进行评价。大规模有针对性地邀请毕业校友进行教学评价，这在国内也是先例。

随着高校越来越注重教学质量，让学生为课程及教师打分已经成为国内大多数高校的普遍做法，但这往往是在每一学期的期末，而那时，学生只不过是刚修完课程而已，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并不具备较好地评价课程价值的能力。毕业校友与在校生

不同，他们对课程的感悟更为深刻和全面，也往往较为客观，其意见和建议将会很好地帮助学校进一步推进教学改革与课程建设，并为在校本科生提供修课指导。

“南开时课”微信评课系统中，毕业校友本科期间所修全部B、C、D类课程(即学科、专业相关课程)及授课教师信息会一一呈现，校友可用0~5星对本科期间所修全部课程进行评价，同时从“有助于读研、有助于工作、有助于出国、感觉没啥用”等选项中勾出课程的实用价值。由于是基于微信传播，此系统设计之初就力求操作简单方便，评教门数也不设限制，校友可随时评价随时提交，能够保证校友在无压力情况下做出更真实有效的反馈。此外，该评教系统还可通过校友职业分布进行大数据挖掘，获得针对特定行业的优质“课程表”。在开放式问题环节，校友可以表达各种意见。相较于数据的搜集，此类信息的搜集会更有助于学校开展有针对性的建设与改革。这一系统的推出，得到了校友的热烈欢迎，短时间内积累了大量的数据，达到了预期效果。

9. 内容丰富、活动精彩的夏季学期。2013年，学校探索实行夏季学期制。适应快节奏的时代以及大学职能的转变是促成高校教学改革的主要原因。学期安排现在是18+18+4，即“两长一短”。四周的夏季学期，主要是采用灵活的教学方式，鼓励学生自主学习、自主实践、自主创新，增加结合专业特点的社会实践。在夏季学期，集中开展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百项工程”等科研创新活动，同时增加素质教育课程、热门课程、双辅修课程的修读机会，大量安排了突出教学与科研有机结合，有学科带头人联席主讲的前沿课。邀请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讲座或授课，并引入了国外优秀大学夏令营、学术论坛、暑期课程等国外教育资源。作为夏季小学期改革的一部分，还选择了20多门课程向高中生开放，对完成课程且成绩合格的高中生发给成绩证书。

“科学夜宴”系列讲座，也面向市民开放，主讲嘉宾都为院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或知名校友等。这些讲座既培养了学生的科学意识，也拉近了高校与社会公众间的距离，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10. 融美育于科学教育，推进德智体美四育融合。2015年底，学校召开了美育工作会，印发了《南开大学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美育工作的意见(征求意见稿)》，这是推进“公能”素质教育、深化德智体美四育融合的重要工作。

学校把美育工作和育人各环节工作看成一个整体，在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全方位加强美育。南开大学的美育不单是传统意义上的美育，更带着时代印记。学校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学校美育全过程，一方面运用各种文艺形式，生动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以恰当的方式把正确的价值观嵌入到美育教学和实践之中，确保美育文化活动不媚俗、不走样。同时，由于处在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全球化成为历史潮流、追求可持续绿色发展的时代，南开的美育努力促进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的统一，积极挖掘不同学科中蕴含的美育资源，引导学



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得到美的启迪和教益，让学生充分体会科学之美。学校也在积极构建科学的美育课程体系，大力开展美育实践活动，加强美育资源的整合利用。

三、围绕素质教育准备做的一些探索 研究型大学的教学改革是一项持续的工作，只有主动求变，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目前，学校还在筹备一些新的探索，寻找新的突破点，力争把教学工作做得更好。

1. 建立“荣誉学分”体系。“荣誉学分”是指学生参加专业教学计划设定之外的课外学习与活动而获得的学分。“荣誉学分”的考核和认定实行申请制，通过学校审核、认可后记载在学生学习档案中。

建立“荣誉学分”体系，旨在规范和引导学生的基本学习行为，实现对学生的良好表现和所取得的成绩进行规范而长效的激励，切实增强学生责任意识，提升实践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素质，增强学生的社会适应性，从管理和制度层面引导学生立“公”增“能”，秉“公”尽“能”。设计中的“荣誉学分”体系包含两大类七小类。“公”之学分，主要是考察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分为志向、操守和襟怀三类；“能”之学分主要是考察学生服务社会之能力，分为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协作能力和审美能力，对应相应的荣誉学分。

2. 实施公共英语改革。学校正在筹划大学公共英语课程改革。此次改革是以服务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战略为出发点，以培养国际化人才为目标。这一轮公共英语课程改革，以突出“研究型”为核心特色，力求通过公共英语课程教学改革，帮助学生提升学习能力和国际交流能力，具体讲就是提升学生使用英语进行学术研究的能力，强化学生使用英语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信息交换的能力。

课程以互联网+的教育思维重组课程资源，通过“初中高三级，选修必修两类，语言技能、学术英语和文化素养三模块，课堂面授、网络课程、个性化学习、工作坊等多课型”立体化课程设置，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课程将采用基于互联网学习平台的混合式教学手段，以大数据为依托的学生评价体系，旨在培养学生较强的语言综合应用能力，良好的学术英语表达能力，国际视野、跨文化交际能力，以开放性、批判性、创新性为特征的思辨能力，以演讲能力、合作能力、沟通能力、领导力为核心的人际交往能力，以人文关怀和科学精神为核心的素养。

在教学内容方面，课程实现三个方面的转变：由基于语言向基于内容(content-based)的转变；由通用英语(GE)向通用学术英语(EAP)转变；由单一语言学习向综合素养培养的转变。通用学术英语是介于专业学术英语(ESP)与一般用途英语(EGP)之间的课程，教学目标是通过学习学术语篇共有的特点，帮助学习者学会用语言来表达专业性知识，进而获得使用英语学习和研究的能力。除了语言技能教学还包括使用英语查阅文献、写作、听讲座、记笔记、演讲等学术学习技能，适应特定的学术文化和道德规范，形成批判性思维意识，培养团队合作能力以及在学术界沟通交流的能力。

在教学手段方面，课程采用基于项目的学习(Project Based Learning)、内容依托式教学(Content-based Instruction)的研究型教学设计教学活动，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混合式教学模式，通过翻转课堂线上线下的学习互动环节，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学习效能，促进有效学习的发生。

3. 筹建学生学习事务委员会。为落实学校章程充分尊重学生主体地位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加强“以学为主、教学相长”教学模式改革，真正做到以学生视角推进学校教学改革，建立新型校园治理体制，学校正在筹建学生学习事务委员会暨学务研究会(简称“学务会”)。“学务会”分校、院两级，分别在学校、学院党政统一领导下，有效整合教学、管理、服务等资源，形成教学工作合力，倾听学生的真实声音，切实促进学生融入学校民主管理，及时、准确、全面、客观地反映学生关心的教学问题。

建立“学生学习事务委员会”，是探索学生参与教学管理、教学运行、教学建设的一项新机制。让学生主动参与学校的教学工作，从学生视角观察教学的方方面面，解决共性问题，进而让学生在民主参与学校管理、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学习和成长。

“学务会”的建立，有助于畅通渠道，搜集问题，能够通过“学务会”反映广大同学的意见，让更多学生关注和参与教育教学改革。同时，通过科学调研，辅助学校决策，“学务会”不定期提交提案和改革措施建议，从而建设成多层次、立体化的学生项目研究团队、新型学生智库和学生自治团体。

4. 对教师开展针对性培训。学校特别重视教师的职业发展问题。2015年教师发展中心启动建立学校、学院和教师三位一体的全员培训体系，并设置教师发展项目，以满足教师教学水平提升和科研素质发展的需要，主要涉及教师的教学与科研领域，首期启动的项目有教学研究项目、教师职业发展项目和教学咨询服务项目。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开展，教师发展中心将关注重点放在了青年教师身上，特别是青年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组织、教育心理等方面的教学能力训练，提高整体教学水平。

四、几个“还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研究型大学的本科教学是个需要常抓不懈的工作，如何解决好教学评价“质”的问题，如何加强办学国际化，如何有效地推动慕课的使用，这在学校今后一段工作中，需要下力气解决。

1. 如何评价教学的“质”

职称晋升、岗位评聘、薪资待遇，在相关文件阐述上都要求与教师的教学表现挂钩，但目前的挂钩也大多停留在“量”的层面，而对“质”的要求并不明确，不能真正引导教师关注教学质量。教学评价也更应该关注“质”，但如何有效地进行教学质量评价，我们还需要多多探讨，需要设计合理的质量评价体系、量化指标，反映出我



们的质量标准和指导思想，并保证这个评价体系的评价结果具有区分度，体现教师教学水平和敬业精神。

2. 本科生的国际交流还比较“弱”和“散”

目前，学校办学的国际化程度尚显不足，每年派出的本科学生数量占比还偏低，吸引外国学生、特别是以英语为工作语言国家的学生攻读学位项目还十分有限。有关学生国际交流的管理工作，也比较分散。学校正在努力通过建立有效的管理与协同机制来解决这一问题，以促进南开大学本科建设的国际化工作。相应地，本科建设的国际化水平提升还应体现在国际化学习环境构建方面。这主要体现在：一是吸引优秀海外留学生和优秀学者的能力；另一个为本科生创造更多的接触、参与高层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机会。但是，这方面的工作还比较滞后，还不够活跃，包括外籍教师还很少。学校要认真总结在评估中暴露的不足。最重要的要努力提高以英文为授课语言的课程的数量和质量，同时适度增加小语种专业。从授课语言来看，全英文课程不仅可以增强吸引海外高水平留学生的能力，同时也是南开大学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和依托。目前，英语课程的数量非常有限，尤其在必修课中，全英文课程无法满足留学生学习的基本需求(这里指完成毕业所需学分)。一些与未来学业发展关系密切的公共必修课程，如高等数学、计算机等仍然是留学生培养的瓶颈课程。这些课程基本以中文为授课语言，以中文作为测试语言，语言障碍影响了海外留学生的学习体验和学业发展。

3. 慕课的推广和运用

慕课作为一种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在辅助教学、方便学生自主学习、促进教学改革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学校鼓励教师使用各类慕课平台，围绕提高教学质量开展课程教学。但是，目前教师和学生对慕课的接受和使用尚在摸索中，慕课数量较少，经验不足。今后如何更合理有效地将慕课运用到教学工作中，还需积极促进与积累经验。南开大学历来重视本科教学。学校两千位教师，锐意创新，工作努力，一直坚持着自己的办学理念与育人传统，扎实，注重实效。在教学质量把控，学生管理等方面坚持“严格”与“规范”，保证了风格的稳定，确保了较高的学生培养质量。可以自信地讲，学校对本科教学的“底”，兜得是比较高的。同时，南开大学也在不断地通过改革与创新，以期在高校“双一流建设”中，努力使本科教学能够位居一流。（朱光磊，南开大学副校长）

（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16年第6期）

浙江大学：构建“基于创新的创业”教育

创新型国家建设不仅需要一大批能够引领思想和科技发展的优秀创新型人才，更需要一大批积极进取、勇于担当、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创业人才，这两类人才的结合点——基于创新的创业型人才，则更是时代急需。当前，“万众创新、大众创业”已成为一种价值导向和生活方式，焕发着时代气息，特别是“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和新科技革命的突破，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驱使高校在构筑创业教育体系时必须形成新的生态，推动高校在教学、科研、技术转移、创业服务、社会服务等各环节进行协同网络式创新。探索形成这样的创业人才培育之路，既是实现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迫切需要，更是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突破口，意义重大。

围绕建设“研究型、综合型、创新型”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目标，浙江大学自1999年开始就把创业人才培养作为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通过四大支撑体系的建设，依托浙江大学在科技创新、人才资源、成果转化平台和创业基地等创业生态建设方面的优势，不断变革创业教育的组织体系，探索出了“基于创新的创业”(Innovation-based Entrepreneurship，简称IBE)教育模式。在“万众创新、大众创业”的背景下，依托该创新创业教育模式，浙江大学师生创新创业热情被进一步激发，据不完全统计，浙江大学目前在校生创业团队有140余支，仅2014年就有20个团队获得创业投资，以创新驱动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以教育提升创业、以政策促进创业的生动局面已基本形成。

构建 IBE 创业教育生态系统

作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高校，人才培养要更具有战略性和创新性。为此，浙江大学在创业人才培养中，明确把IBE的人才培养作为基本方向，依托浙江大学学科综合和工程学科的优势，面向工科学生培养其创业素质和能力；把企业家精神融入教育教学活动全过程，鼓励学生关注战略性新兴行业领域的技术型创业；依托浙江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工业技术研究院等，搭建好创新和创业平台，推动学生实现科研成果的转移转化；借助师生的IBE活动，助推学校人才培养和科技成果产业化模式变革，进而建立基于创新的创业教育生态系统与培养模式。

倡导以创新为基础的创业，源自于大学必须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使命。我们来看几个数据：在福布斯榜单，中美两国30岁以下创业者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在行业分布上，美国年轻人主要在互联网、生物制药、新能源、媒体、餐饮等多个领域自由发挥创意，而中国年轻创业者则扎堆互联网和传统电子商务。从年龄分布看，美国青年创业上榜者的平均年龄为26岁，中国青年创业上榜者的平均年龄则为28岁。在创业理念上，美国青年创业者更擅长从技术、产品、服务创新入手，寻找打破行业固有格局的着力点，而中国青年创业者更擅长从应用着手，寻找传统产业在网络平台新应用。

那么，中美两国青年创业者之间存在的这种创业着眼点的差异会给未来带来什么



影响呢？目前的年青人是未来的企业领袖，如果他们不能把创业的着眼点落到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创业行为上，中美之间的产业竞争格局就依然难以逆转。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浙江大学前瞻性地提出要建立“基于创新的创业”（IBE）教育生态系统和人才培养模式。

浙江大学IBE教育生态系统建设围绕“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愿景，立足全球视野和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需求，秉承创业教育的优良传统，深入挖掘自身的技术和人才优势，将推动大学生基于创新的创业人才培养作为培养“时代高才”的核心战略。IBE生态系统有四大支撑点，一是基于“技术产业化”的创新创业教育方向引领，形成导向支撑；二是基于“通识教育”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建设，形成机制支撑；三是基于“全球国际村”的创新创业教育国际化实验，形成经验支撑；四是基于“全链条式”的创业教育过程实践（创业意识激发-创业技能培育-创业团队打磨-天使投资对接-创业项目的落地），形成成果支撑。在四大支撑的强大合力下，浙江大学探索形成了三大可复制、可推广、可行性强的创业人才培养模式，初步搭建起“学研产用”相结合、分层次分类别、基于创新的创业教育架构。

探索IBE人才培养三大模式

1.模式一：“工科专业+创新能力+创业素质”的综合型培养模式

早在1999年，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与浙江大学竺可桢荣誉学院就联合开设了创新与创业管理强化班(Intensive Training Program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简称ITP)，在国内率先尝试走“工科专业+创新能力+创业素质”的综合型培养路径。ITP旨在培养具有扎实的工科专业知识、出色的创新能力和优秀的创业素质的高科技产业经营管理创业型人才，培养具有国际视野、本土智慧的未来企业家。

该模式下，ITP的特点在于：其一，创新招生模式，促进学科交叉，优化课程设置，重组优质师资。强化班每届60名学员从全校理工农医各个大类专业本科二年级的优秀学生中经初选和复试二轮选拔而出，打破了原有院系间的学科隔阂，围绕企业家精神的培养和相应管理知识与技能的复合，精心设计创新创业类课程，凝聚了一批富有创新精神和朝气的中青年教师为学生授课。其二，突破传统教学模式，激发创新潜力，陶冶学员的企业家精神。围绕学生创新潜力的激发，提出挑战性案例，指导学生讨论，走出课堂开展调研活动。邀请产业界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创新创业成功人士担任创业导师，让学生直接参加企业创业实践，激发学生的创业兴趣和创新能力。其三，自主导向学习，搭建创业实践平台。在实践型课程设置上着重推进企业见习和创业设计两个实践环节的开发。ITP与许多高科技企业合作，让学生利用假期进入高新技术企业实习，对企业进行详尽的案例分析，然后在创业设计环节中，通过小组形式设计完成实战性的创业方案。目前，ITP的实践平台已经走到国外，与以美国斯坦福大学为基地的亚太学生企业家精神协会（ASES）建立了合作，丰富的海外实习和交



流经历拓展了学员们的国际化视野。

开班 16 年来，强化班已培养 800 余名学生，平均毕业 5 年后创业率高于 20%，远高于浙江大学平均水平，04 级强化班学生的创业率高达 30%。在 2014 年，浙江大学进一步优化培养模式 (ITP2.0) (如下表)，使创业实践色彩更加浓厚，创业教育效果更加显著。

2.模式二：“国际创业教育+海内外互动+海外创业”外向型培养模式

要让以创新为基础的创业走到国际市场去，最根本的途径是创业人才先到国际平台上去整合科技资源实现技术型创业。为此，浙江大学首创了全球创业计划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简称 GEP) 培养模式，把创业生态系统延伸到国际一流平台上去。自 2009 年，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美国百森商学院(全美创业管理连 15 年排名第一)、法国里昂商学院(欧洲创业管理排名第一)联合发起中美法三校联合培养全球创业管理硕士生的 GEP 项目，该项目由三个一流的创业人才培养高校分头招生约 25 名 (即每年约 75 人)，然后集中在 GEP 这个平台上共同学习，每年在三个国家分别学习 4 个月，采用全英文授课和实践。该项目致力于培养具有较强国际视野、交叉文化背景、熟练外语能力、技术创业素质的外向型人才，5 年来已经有近 30 个国家的 300 多名青年学生在这个平台上共同学习和联合创业，并开始结出硕果，已经有多名国外学生因为在中国学习找到商机，在中国开始创业。

除了 GEP 这样的国际创业教育平台外，浙江大学还把创业平台直接设到国外去，促进海内外互动。浙江大学与硅谷创业园、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等建立了良好的创业互动平台和交流机制，与斯坦福大学、硅谷孵化器联合成立“浙江大学硅谷创业实验室”，每年选拔优秀创业学生到美国硅谷、UCLA 商科中心等交流访问，为浙江大学搭建对接世界高科技创新创业的沃土——硅谷的海外平台，抢占世界创新创业研究与实践的制高点，为浙大师生的创新创业研究与实践提供良好的教学实践平台。

为持续深入地推动国际创业教育和海内外人才互动培养，浙江大学还牵头组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创业教育联盟，通过与国际创业教育组织合作，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设立创业教育教席。浙江大学作为“世界创业论坛”的发起单位之一，积极参与打造全球创业资源的交流共享平台，和杭州市政府共同举办第 8 届“世界创业论坛”年会。

为了支撑 IBE 人才培养的可持续性，浙江大学还延伸形成了以学术研究、专业教育、创业培训、创业课程相结合的基于创新的创业教育体系，成立了亚洲首个创业管理博士点，与国外高校进行创业管理硕士生联合培养，开设创客训练营和创业培训班，开发创业课程，进行全程教学并做专项辅导和突破。

3.模式三：大学生微创业联盟的生态化全链式培养模式

浙江大学创业生态系统，指的是以浙大情感和文化维系的，以校友和在校生为主要人才储备的，以浙大雄厚的实力和校友社会资产为核心资源储备的，广泛辐射带动周边的互联互通、动态系统的创业环境和企业家队伍，并由这样的环境和队伍去带动“浙大系”创业成长。

一是科技创业生态基础设施。之所以能形成“浙大系”并成为浙江省和杭州市创业的生力军，就源自浙江大学长期培育形成的“生态化、全链式”培养模式。浙江大学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10个）、国家专业实验室（4个）、国家工程实验室（1个）、国家工程（技术）中心（6个）、省部级校级实验室（111个）、国家大学科技园、工业技术研究院、创新技术研究院、先进制造研究院、技术转移中心等诸多涉及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实际应用的良好平台，这些平台成为了浙江大学 IBE 的科技支撑基础，形成了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应用园区孵化相贯通的生态基础设施。

二是科技成果集成网络平台。打造了以“微创联盟”为网络组织的专业科技成果整合平台，目前，该微创联盟已经集聚140余支创业团队，业务涉猎机械电子、软件网络、生化环境、文化创意、传媒广告、农林食品、教育培训、服务咨询等类，扩散形成了良好的创业生态圈，吸引众多天使投资开始关注、青睐大学生创业。

三是创业融资系统优化。浙江大学设立创业扶持基金用于IBE教育，积极争取天使投资人、风险投资机构、政府的各类创业扶持资金与创业团队对接，建立风险投资联盟提供投资、融资服务，为学生创业团队和社会创业资本架起了桥梁。目前在校设立大学生创业孵化基金累计已超过5000万元；有6个学生创业团队获得500万人民币以上的创业投资，其中最大的融资规模已经超过3500万元。在浙江大学微创联盟中，到2014年已有注册公司40家，20支队伍拿到创业投资。在浙大科技园中，学生创办的企业达115家，涌现出一批学生创业明星企业。

四是创业辅导系统建设。为了扩大创业生态圈，浙江大学进一步拓展了勤工助学和创业指导中心、创业训练营、未来企业家俱乐部、研究与创新俱乐部等校级学生创业组织，以及创业工场等数十家院级学生创业组织，形成生态化、全链式创业辅导体系。在辅导系统的运作支持下，浙江大学平均每年设立1600余项各级学生科研训练项目，辐射近万名学生；举办天使对接项目大赛、蒲公英创业大赛、基于创业平台的创业（PBE）大赛等创业比赛，构筑学生创新创业实训集群。

推进 IBE 生态系统建设的政策支撑

为了更好地推进IBE生态系统建设，浙江大学在面向基于创新的创业政策上，也形成了相应的子系统。在创业政策子系统中，最重要的是创业资源的支持、科技成果转移政策的支持、教师参与IBE生态系统建设、教师分类管理政策和校企合作促进创业的政策等五个方面的政策。

强化资源汇聚型校内创新创业载体建设。学校加大对IBE的载体建设支持力度，扎实推进众创空间和创业苗圃建设，启用了1000平方米的学生初期创业孵化基地，

鼓励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打造一流的创新创业活动平台。学校正在探索分布式、集聚式、平台式、驿站式以及“科技服务平台-科技大楼-产业孵化园”三位一体的科技成果转化新载体，依托新型创新创业载体，孵化新创意、拓展新思路、形成新事业的窗口和平台。学校对于认定的众创空间，给予启动经费支持，并且按照面积和项目情况给予每年运行补贴。以市场化运作搭建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专业化平台，与企业合作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建立科技成果信息采集、发布体系，实现产学研之间基于市场机制的充分对接。

促进校地合作和校企合作的政策。浙江大学和校外企业及地方政府加强合作，获得师生创业的空间，以及相应的优惠政策。2014年，浙江大学与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建立合作关系，共建大学生创业苗圃，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园为大学生创业苗圃专门开辟创业园区，共建2000平方的浙大创客空间。为了整合企业家资源，学校在校企合作上，通过“求是强鹰实践成长计划”、企业家创业论坛、创业者导航沙龙等方式，实施“大学生创业导师计划”，聘请200余位知名企业家、投资人、行业专家等担任校外创业导师。

鼓励成果转化活动，倡导教师“阳光创业”。浙江大学健全科技评价和人事管理制度，完善成果转化和企业孵化的利益分享制度，支持教师“阳光创业”，形成教学科研活动与成果转化活动间的有效对接，由此构建起原始创新、技术研发和成果产业化为一体的科技服务体系，建立科技创新协同发展体制。在现有体制下，要教师离职离岗创业，既可能削弱教学和科研的力量，还存在各项制度的束缚，通过鼓励教师“阳光创业”，可以较好地解决产业化过程的技术接口问题，有利于解决产学研合作的问题，还可以快速培养起一支充满活力的基于科技创新的青年创业者队伍。

完善教师分类晋升和分类发展机制。加强科技成果转化支撑队伍和成果转化“经纪人”建设，强化人员分类晋升，分类发展，充分调动教师面向企业和社会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积极性，是浙江大学对教师进行分类管理的重要动机。学校对从事成果转化的科研人员采取不同的评价标准、机制和方法，对介入科技成果转化的科研人员，建立“市场价值与社会效益相结合”的评价模式，对参与市场化成果转化和企业经营活动的人员，主要借助于第三方评价和市场化收益方式给予激励。

总体来说，IBE生态系统立足当下、面向未来，进一步汇聚社会资源，促进以创新为基础的科技型创业，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从技术创新入手带动创业，打破行业的固有格局。通过创新创业吸引创投获得扶持，培育和弘扬企业家精神。通过IBE文化建设，形成了高技术创业的体系氛围。通过与外部企业、科研机构等组织的合作，吸引高校伙伴和社会资源的加入，共同打造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基于创新的创业生态圈，支持大学生的持续创新创业。（作者严建华、魏江，单位：浙江大学，严建华为副校长）

（来源：《中国高等教育》2016年第12期）

西安交大：推进科研体制机制改革激发人才潜力

一个月前，叶凯结束在美国的助理教授职务，告别爱人和7岁的孩子，只身回国到西安交通大学报到。4月2日，西安交大为其成立“叶凯青年科学家工作室”，这是该校首个以80后青年科学家名字命名的工作室。

此前，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高校也向叶凯伸出过橄榄枝，“有的还给房”。但叶凯最终选择了西安交大，“科研自由度是吸引我的最大原因”。

近年来，西安交大探索打造“学术特区”，推进科研体制机制改革，取得了耀眼的学术成绩。

“把舞台搭好、让土壤肥沃起来，不怕人才来了长不成大树”

工作室成立后，叶凯将在这里组建多学科、多功能团队，进行他所擅长的生物信息分析研究。例如，从陕西的人种遗传信息入手，继而一路向西，研究新疆乃至中亚地区的家族病、地方病。

在青年科学家工作室之前，西安交大已经有许多科研体制机制创新的实践和成果，前沿科学技术研究院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从2010年成立至今，前沿院在国际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已经进入世界前80至100名一流大学同类院系的水准。

成立伊始，前沿院就以很高的筛选标准面向全球招聘教师。目前该院的44名教师中，包含4名外籍院士、9名中组部“千人计划”学者、6名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学者、1名国家基金委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在管理模式上，前沿院采用教师Tenure-track（终身教职评定）聘任制，并配以与之相配套的评估和晋升机制，“就像一个装了红烧肉的瓷饭碗，待遇高，但竞争也更激烈，同时让专业的团队负责行政事务，让科研人员专注于科研”。“就像热带雨林不怕长不出参天大树一样，我们把舞台搭好、让土壤肥沃起来，不怕吸引不了人才或者人才来了出不了成果。”前沿院院长任晓兵说。

“机制创新就是解决一个又一个具体问题并且制度化”

“以前每学期一开学，学生们凌晨三四点就带着小马扎到学院门口排队，等着人工预约实验设备使用时间，大家生怕约不上，于是一约就约满一整学期，结果又常常出现约了没人来用的情况。”说起刚来学校时目睹的这一现象，西安交大材料学院微纳尺度研究中心教授单智伟说，“学生白白消耗精力，设备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出现问题就赶紧想办法解决。”微纳中心组织技术团队，自主研发了信息化预约管理软件“易约”。对学生而言，“易约”能显示未来两周的预约权，在网上即可操作；对于管理者而言，“易约”的魅力在于数据化和信息化，使用情况、设备利用率、

设备预约趋势、设备故障情况等信息一目了然。

单智伟愿意用这些简单的例子来阐释微纳中心科研机制创新的理念：“机制创新其实就是解决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问题并且制度化，当90%的琐事都能有章可循不用问领导时，效率自然就提高了。”

成立不到7年，微纳中心不仅每年都有成果在《自然》等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并且很多论文的第一作者都是在读博士生、硕士生。

“规模到一定程度，必须抓好团队建设”

科研体制机制创新带来丰硕成果。以前沿院为例，2015年，前沿院国际高水平期刊论文发表量是27篇，人均发表量在全国排名第一。2014年，前沿院获多部委联合颁发“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称号；学院多名教授入选全球、全国“高被引科学家”榜单……

任晓兵说，体制机制的活力激发了教师的活力，教师又感染着学生，大家搞科研都很拼，每天晚上灯火通明。这样的科研激情在西安交大随处可见。

单智伟认为，微纳中心规模的不断扩大就是游击队发展成正规军的过程，“规模到一定程度，必须抓好制度建设和团队建设，把绝大多数事务规范起来，否则领导将被无穷尽的琐事缠身”。

西安交大副校长王铁军在总结科研体制改革经验时说：“以前搞科研往往是‘个体户’，而工科很多时候适合大团队合作，希望通过机制创新组织大型科研团队，建国家级大平台，才能承担大任务。而且，要改变以往单一重视论文的评价机制，专利、转化应用都应该纳入成果评价体系，才能更好地激励科研人员。”

“有成果也有问题，如海归人员有些水土不服的问题，学术特区相当于把海归保护起来，各种条件给得很多，让他们在外面争取经费的能力和融入集体的能力偏弱了。下一步，希望他们能更好地融入学校和社会大环境。”王铁军说。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6-6-25）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小微课 大教改

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课余时间里有那么点儿不一样——学生们闲聊的身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或拿着手机、戴着耳机，或端坐在电脑前津津有味地观看一个个微课视频。

近年来，微课教学改革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大部分学院展开。学校通过青年教师讲课比赛、微课教学比赛等形式扩大微课教学在教师中的影响。该校首次组织教师参加全国高校微课教学比赛就有5件作品获奖，学校也获得优秀组织奖。而这一切，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学发展中心主任陈遇春看来，又是自然而然的，因为“微课看起来微小，但却是教改的好推手”。

微课更加结合“校本”

为了呈现几分钟视频花费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放在其他高校中似乎不可想象。然而在农业大学却不是稀罕事。

相比较理工科课程，农学课程有自身的特殊性，那就是有时候必须花费大量时间观察生物的多样性以及动植物的生命现象。教师采集动物胚胎标本不是天天都可以，必须抓准动物生理上的时机，甚至有时候还会触碰伦理观念。对此，教授“动物胚胎学及胚胎工程”课程的教师魏强深有体会。为了采集牛和羊内分泌系统的差异，他用了两年时间下到动物实验站收集样本，最后他将素材整理成两个视频，浓缩到微课中只有短短的三分钟。

而微课在学科上所体现的差异性，正是反映了一个学校的学科特色。陈遇春将之称为“校本”。尽管眼下高校纷纷推广慕课，但在他看来，“慕课的整体性强、信息量大、传播方便，但它的缺点在于针对性差。每个学校的培养方案、课程教学、考核方式都有所差异，慕课教学带有‘广谱、通用’性质，而微课恰恰结合了‘校本’特点，具有课程的个性，能有效破解该门课程中学生的重难点、兴趣点。”于是，一场微课带动的教学改革就这样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为了推广微课教学，教育部已先后举办两届全国高校微课教学比赛，希望以比赛带动微课。然而，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却是“反其道而为之”——先有微课培训，后参加比赛。

该校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了教师“教育技术发展需求”问卷调查，并组建起首支“教育技术与应用”培训团队，每年举行8场培训及沙龙活动，先后送出10余批次的教师到国内微课教学开展得好的高校进行学习，并邀请台湾大学教授王秀槐、清华大学博士韩锡斌等知名专家以及智慧树、尔雅、清华教育技术研究院等团体来校联合举办教学工作坊。那么，在他们的精心打磨之下，学校的教学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更要顾及学生评价

在没有参加培训前，不少教师认为，微课就是实际课堂中的教学片断，把课堂中有趣的东西、重难点呈现出来。然而，“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费力制作的视频学生都特别愿意接受，但事实上，学生的兴趣点并没有被提起来。这正是在线教学的一大通病。其原因在于教师把握的重难点与学生需求的重难点、传统课程的重难点与微课课程的要点并没有找到契合点。”陈遇春说。

怎么打破这一局面？热衷于教改的青年教师开动脑筋。信息学院基础教学部教师陈勇主讲大学计算机基础、程序设计基础两门全校公共课程。在两三轮的摸索中，他尝试建立了一个师生互动的小网站和微信平台，对于学生们每个章节所掌握的内容，

他都通过网站、微信及时把握，并将学生反馈作为评定成绩的要素。这种有效反馈和多元评价成为该校微课推广中一大示范。

通过一轮轮反馈，教师们发现微课因课而异，有些课程单是把重难点作为微课的内容，效果并不好，他们尝试着挖掘传统课堂与微课的差异性需求——部分知识点用微课呈现，却不再课堂上重复讲解，而是作为课外知识的有益补充或者是预习、复习的要点。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反馈的共性问题进行解答。

资源环境学院水保专业学生闻惠钰兴奋地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没事儿我们就坐在电脑前看微课视频。一次不懂再看一次，自己看不懂就向同学请教。大家都不懂就集中反馈到课堂上，有针对性地予以解决。”

“不能把微课看作是自己的成果表达，而是把微课看成推进教学改革的能力。”陈遇春说，这是教学发展中心在微课培训中强化的一个观念，“一旦具备这种能力，很快就能找到线上、线下教学的结构安排。”

重在课程教学体系的重构

陈遇春所说的“能力”，具体而言就是课程教学体系的重构能力，而说起教学体系重构，就不得不提教改中的受益者。

有机化学课程任课教师王俊儒长期坚持做双语教学和教学内容、体系的扩展，并在该校创新实验班取得了很好的反响。然而，由于接受能力的差异，大面积推广到普通班时却遇到了障碍，学生积极性不高、反应迟缓，这让他很着急。考虑到学生天生都有避难就易的心理，教学发展中心的教师与王俊儒商量用微课作课程改革，把教学当中的重难点按课题理念提取出来，最后他整合了20多个微课片断，对教学体系做了重构。他也因此获得了陕西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教师杨江涛从2012年开始，利用录屏软件制作微课，开展工程测量课程教学改革。2015年，他在微课教学基础上利用手机云班课平台实施翻转式教学改革。“改革后的课程教学主要分为课前在线自学、课堂分组讨论、课后实践验证三步进行，极大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效果，培养了他们创新思维能力。”

杨江涛的改革经验有效地弥补了国内关于翻转教学模式偏理论研究轻实际探索的空白。近年来，他在“两岸四地教师教学发展论坛”“全国农林院校互联网+教育高峰论坛”等会议上作了经验交流，并作为实战名师参加“蓝墨公益课堂全国巡讲”。

如今，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更多的“王俊儒”“杨江涛”加入到微课制作的大军中。而对于如何激发教师制作微课的积极性，学校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据陈遇春介绍，微课作为教学型教师职称晋升的指标，已列入教学水平评价中，且比重较大。学校给予了系统的支持，如培训、指导、沙龙、经验分享，让教师在参与的过程中感觉有兴趣。与此同时，学校不断地把教师的微课成果、经验以沙龙的形式向外推广，让教师在分享中获得荣誉感。



对此，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校长罗军表示：“学校将进一步配套激励政策，提升培训水平，加强教学创新，坚持以赛促学，‘软服务+硬推广’相结合，有效推进学校‘互联网+教学’建设进程，为争创‘双一流’做出更大贡献。”

(来源：《中国科学报》2016-6-30)

长安大学：创新新生教育工程

有的学生高考分数很高，可入校一年所欠学分就达到了退学程度；有的曾是父母眼中的骄傲、老师嘴里的标兵，入校后却沉迷网络不能自拔；更有的，以前健康、快乐，现在却因一句话走上绝路……谈到每一次的学生违纪处理、突发意外事件，长安大学党委副书记白华都深感惋惜和责任重大。

“我国的教育发展是断链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面，没有链接好。”白华说，从中学的“保姆式”到大学的“彻底放手”，大学新生面临诸多困惑，能否解决好这些问题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

2003年，长安大学新生教育工程启动，并于2008年正式立项，同时被纳入校重点建设项目。经过10余年探索，如今，已形成包括6大模块、60个必修项目、95个选修项目在内的全方位系统性工程，从而帮助新生“入好门、学好业、走好路、成好才”。

从1个月延长至1年，6大模块构建全套“系统”

参加入学典礼、参观校史馆、接受军事训练、听安全健康讲座……这些新生教育方式几乎是每个高校新生入学的必修课，但在长安大学，通常为1个月的新生教育被延长到了1年，“这套计划的推进实施，是个逻辑递进的过程。”该校学工部部长张骞文表示。

新生教育工程包括6大模块：入学与适应性教育，通过学籍学分制政策学习、校情校史学习、生命安全与心理教育等，帮助新生尽快实现角色转变；素质与养成教育，通过军训、文明班级、宿舍创建，培养学生的纪律观念和集体生活习惯；学科专业与职业认知教育，通过举行校友报告会、院长沙龙，开设职业规划课，增强专业认同感，主动规划大学生活；同时还开展学风培育与学务指导教育、成长与发展教育、奖励与资助教育。

在张骞文看来，新生教育工程取得良好成效的关键，“在于整合了资源、形成了系统”。这个系统不同于以往的“单一体”和“讲授灌输”机制，它打破了单一部门负责的局面，构建起学校统一领导，多部门、各院系、全体师生共同参与的“共同体”机制。

“虽然不可能把4年的事情全部在1年内解决，但新生教育确实能够帮助学生形成对大学的认知，让他们带着自主意识进入大学学习，这也正是高校办学的目的。”白华说。

适应教育：从精神到物质，从“济困”到“强能”

刚入学时，自由轻松的氛围让该校工程机械学院学生黄栋一度失去了方向。“那时的我整天无所事事，上课从没认真听过。后来实在无法控制自己，只能用拳头疯狂击打头部发泄。”黄栋说。

幸运的是，在全校新生的心理健康普查中，黄栋的状况引起了心理咨询中心老师的注意。经过老师的悉心开导，黄栋参加了新生心理培训，他的抑郁症状被扼杀在了萌芽状态。不仅如此，通过成长与发展教育，黄栋还在音乐和舞蹈方面发现了自己的潜能，加入了学校文艺社团。

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应试教育背景下，独生子女适应能力差，入校后遭遇‘新秀墙’的新生不在少数。”每年，长安大学都会对所有新生进行心理测试、举办心理讲座，让每名新生都知道心理咨询中心的地址和电话。

目前，心理咨询中心一年接受的个体咨询已达 600 余人次。与 10 年前相比，学校老师和学生对心理咨询的认识也有了转变：不再认为做心理咨询是“看病”，而是为了有更好的提高。

除了帮助新生走出心理困境，地处西部、农村生源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多的状况也促使长安大学将对困难学生的帮扶列为新生教育工程的重点之一。

靠着从亲友处东拼西凑来的几千元和助学款，李永胜才得以成为该校工程机械学院的一名 2015 级新生。他一天的伙食费只有 8 角钱，为抢一碗免费汤，他常一路小跑到食堂。是学校的帮扶政策和老师同学的关心，让李永胜度过了那段艰难时光。

在长安大学，每年经过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占学生总数的 37%，而像李永胜这样特别困难的学生占 12%。学校为这些学生建立起从物质到精神、从“济困”到“强能”的完整帮扶模式，将传统的保障型资助提升到发展型、教育型资助，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能上学、上好学。

学校实施的“精准资助”机制，让贫困学生感动。每年，学校都会搜集、分析学生食堂的消费数据，发现有花费极低、特别贫困的同学，学校会采取“隐形资助”方式，将资助金直接打到他们的饭卡上。在长安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奖学金的人数，每年占到全校获奖人数的 40% 以上。

学业教育：艰苦类专业，认同感提升 6 成

作为一名调剂生，2013 年入学的方唯振曾对就读的遥感专业心生抵触，他找到辅导员说：“我对遥感没兴趣，要转专业。”可是，辅导员的反问“你知道遥感是学什么的吗”，让他无言以对。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方唯振去听了专家、学者和杰出校友的报告，选修了职业规划课。没想到，渐渐深入的了解竟让他对遥感产生了兴趣。1 年后，方唯振以专业第一的成绩拿到了国家奖学金，并主动放弃了转专业的机会。如今，他已连续两年获得



国家奖学金，并凭借“挑战杯”金奖成为学校的“十大科创风云人物”。

以公路交通、国土资源、城乡建设等专业为特色的长安大学，开设的多为艰苦类、面向基层服务的专业，像方唯振这样对艰苦类专业有畏难情绪的学生不在少数。以地质工程与测绘学院为例，新生专业调剂率一般在50%左右，最高时达80%。

如何稳定这些学生的情绪，让他们了解艰苦类专业？新生入学伊始，地质工程与测绘学院就开设了由教授、博导讲授的专业概论课，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让学生了解本专业的“前世今生”，并看到光明与挑战并存的“未来”。通过学科专业与职业认知教育，艰苦类专业的新生认同感已从2003级的20%左右，上升到近年的80%以上。

不仅如此，学校还在学风教育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以公路学院为例，新生自我管控力弱、沉迷游戏，使该院的退学率一度居高不下，退学人数有一次竟达12人。如果选聘优秀教师担任班主任，能否发挥他们的专业优势，加强对学生的学业指导和学风引导？

2009年，班主任制在公路学院试行。同时，“黄牌警示”和“挂牌考试”也成为学院的两张王牌：“黄牌警示”，即对每一学期期末考试挂科两门以上的同学，开展警示谈话和“一帮一”助困活动；“挂牌考试”，是在每学期期末考试期间，对全体班、团干部及学生党员实施亮牌参加考试，以标识牌亮明身份，倡导诚信考试，发挥学生干部榜样示范作用。一系列措施之后，公路学院的退学率明显下降，近几年平均每年仅有三四名学生被劝退。

“对长安大学来说，新生教育工程的实施，不仅有效减少了该校新生从中学生到大学生这一角色转变中出现的焦虑现象，减少了因恐惧艰苦类专业要求退转的现象，减少了因不适应学分制考核批量挂科的现象，也减少了因不适应奖惩测评等考核受挫的现象。”张骞文说。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6-6-16）

西交利物浦大学：国际化不是目标 而是基因

国际化应当是一种大学的机制，大学为学生和教师提供整合国际资源和参与国际化学习和科研的平台，既包括硬件水准的国际化，也包括软件层面的国际化。国际化的最高层次是师生员工包括大学真正成为世界玩家，可以在国际上有上乘表现、可以发声和参与规则制定！

今年是西交利物浦大学（以下简称“西浦”）开办十周年纪念。经过十年的发展，该校已受到不少学生和家长的认可，在高等教育界内的改革与实验意义也持续引发教育专家、学者们的关注。

日前，西浦执行校长席酉民对话《中国科学报》记者，与读者分享了他眼中这所“真正国际化”的中外合办大学的发展特色。他并不欣赏外界冠之以西浦头上的“洋大学”称号，在他看来，西浦的办学理念和发展模式是符合全球发展趋势及社会需求的，也是高等教育应对各项变革与挑战的积极回应。

以学生为中心

正是高考结束，考生开始考虑择校的志愿问题。而在过去从无到有的十年中，西浦吸引了越来越多关注的目光，也得到了不少学生及家长的信任。那么，学校人才培养模式究竟有何过人之处，才会令学生和家长不畏高学费选择前来就读呢？

对此，席酉民给出的答案很简单：“因为西浦真正把学生的发展放在心上。”

他进一步解释：“首先，从根本上来说，学校关心学生成长是天经地义的，这也是大学回归本质的一种体现。”席酉民认为，这种办学思路解决了学校发展的本质问题。

其次，席酉民表示，学校在对教育趋势、时代发展特征等理解的基础上，树立正确的教育观，这解决了办学的理念问题。“比如，西浦不会想要控制学生，而是重视培养他们的独立能力、责任感，释放他们的潜能等等”。

当然，解释至此，都是办学思路、教育理念等比较理论层面的内容，那么，怎样才能把上述理念真正落实到学校实践的方方面面呢？

席酉民告诉记者，西浦所做的第一步是“让所有人理解”，这里的所有人指的是与学校办学相关的利益相关者们，从学生到家长，从普通教师到学校管理及行政等支撑服务者们，其实还包括上级主管、同行和社会上的利益相关者。

“我们利用各种机会反复向学生及家长们解释西浦的教育理念，也在开学典礼、校园开放日等场合尽可能地让他们了解和体会学校的理念与文化。”他解释道，之所以非常重视“理解”这一过程，是因为理解是各方在实践方面真正改变行为的基础。

“最后，我们希望经过各方的努力，能够通过以学生为中心的各种实践创造出氛围，从而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文化固定下来。”席酉民说。

5月20日，西浦在高等教育创新年会西浦教育论坛上首次发布《以学生为中心育人体系建立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席酉民表示，《指南》既是西浦实践的理论总结，也是西浦希望在教育改革中发挥影响力创新尝试。《指南》旨在进一步推动提升国内高校办学中“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引发高等教育界对国际教育重塑机会下中国教育如何应对挑战以及“以学生为中心”的育人体系的研讨和实践。

教学为生，科研为升

在采访中，席酉民提到，可能西浦在学生和家长眼中的第一印象是“留学预备营”“出国很方便”等，但实际上，西浦不仅在教育上有很深的探索和成功的实践，在科研方面也十分注重。建校伊始，学校就定位为建设研究导向型大学，在学校下一个十年的发展计划中，科研就是重点之一。

对于西浦教师来说，进入这所学校教书不容易，但进入这所学校之后所获得的自由空间却又足以令他们欣慰。

所谓的进入很难，是指西浦招聘教师时的国际做法。“我们都是面向全球人才招聘，考查申请者的学术造诣、教学及科研方面的积累或者潜力，以及其对教育的热情。”席酉民说。

据他介绍，西浦对教师提出的目标是“教学为生，科研为升”，换言之，教学是第一位的任务，而科研方面，教师可以全凭个人兴趣出发，或借助学校搭建的科研平台进行校内外和国内外的科研合作。国际水准的薪酬水平保障了教师的生活水平，同时学校不在科研方面对教师作限制，对于一些政府科研基金、项目的申请，学校也只是鼓励教师参与，并不设硬性考核指标。

“做科研，对于老师们来说，是个人兴趣的满足，也是他们自身在学术界发展的必经之路。在这方面，学校给予了他们充分的自由，帮他们结合自身兴趣去探索和发展。”席酉民说。

在西浦，教师因为受到“教学为生”要求，对教学自然尽心尽力，科研可以从兴趣出发，除此之外，在学校的服务和管理方面，他们也“感觉不错”。

“最直观的例子就是，在西浦，任何老师可以很方便地找到校长聊天或者反映情况。而这在一般国内高校中是非常难的事情。”席酉民举例道。

他还向记者展示了手机中一段某教师发来的微信文字。这位曾经在国内某著名高校工作多年的教师向席酉民感慨，西浦给予教师的自由和支持实在是令他感动。

真正的国际化

近年来，国内有越来越多的中外合办大学陆续开办，除西交利物浦大学外，还有宁波诺丁汉大学、昆山杜克大学等，一些海外名校也开始来到中国大陆开办分校，如上海纽约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等，与此同时，国内大学尤其是一流高校也在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国际化水平，在教学科研等方面都越来越重视国际视野。

面对这种发展趋势，席酉民表示，我们应当对国际化进行正确的理解。“什么叫国际化？提到这个概念时，人们最常见的理解就是指标层面的国际化，比如国际留学生比例、国际教师比例、英文授课的课程数量、是否选用原版教材等等。”他说。

尽管这些指标也是目前各种大学排行榜衡量大学国际化水平的普遍考查指标。但在他看来，这种对于国际化的理解和追求未免有些肤浅。

在席酉民看来，国际化应当是一种大学的机制，大学为学生和教师提供整合国际资源和参与国际化学习和科研的平台，既包括硬件水准的国际化，也包括软件层面的国际化。而那些指标层面的国际化，应当是大学在国际化发展过程中顺带达到的水平，而非刻意追求的目标。国际化的最高层次是师生员工包括大学真正成为世界玩家，可以在国际上有上乘表现、可以发声和参与规则制定！

作为一所中外合办大学，西浦在创办之初就有着天然的国际化基因，而谈到西浦的育人目标时，席酉民说，“世界公民”四个字是西浦的最终目标。

设定这一目标的理由也很容易理解：作为一所国际大学，西浦培养出来的学生，无论毕业后在哪里工作，都要有全球视野和竞争力，因为他们要在全球市场上拼搏和发展。

如何培养世界公民

那么，“世界公民”目标背后意味着应当具备怎样的能力呢？

“跨国界、跨文化、跨专业的教育才能培养出世界公民。”席酉民说。

“要参与世界竞争，首先，需要一种跨文化的理解力。其次，应该拥有一种复杂的心态。”他解释道，我们过去训练人的时候基本上是科学的心态、科学理性的分析。但是，现实社会的复杂，让你必须有除了科学以外的对人的理解。

“此外，学生还需要学会整合思维，包括西方的分析哲学以及东方的整合哲学，如何有效地结合两种哲学思维。学生还应当不惧怕变化，积极地拥抱变化，擅长变化管理。这是未来跨文化管理必须具备的东西。”席酉民说。

席酉民坦言，这样的目标对于教育者提出了挑战，必须再定义大学，反思教育，重塑教学。他说：“就大学使命讲，我们看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么样培养，我们就会感觉到肩上的担子非常重。因为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教育，已经跟不上时代的需求。我们必须改进。”

在这样的挑战面前，传统的教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听的教育方式，已经不是时代需要的教育。席酉民强调：“学生根本不需要简单地去记，一部 iPhone 基本上可以把大百科全书全装进去，学生想了解的东西随时可以查阅。”

席酉民告诉记者，他对西浦的学生和家长常讲一句话，“大学不是一个学知识的地方，学知识是一个过程、一个手段，大学是让学生通过学知识成长的地方”。

而现在，西浦在做的事情是把学校和网络同样变成一个资源平台，在具备这样的资源条件下，思考和探索让学生从一个吸纳知识点的气球变成一个有造诣的人。“我们试图通过改变教学过程，改变教学方法，让学生变成有造诣的人，同时实现有知识的深度、广度和高度。”席酉民说。

作为校长，席酉民希望学生具有全面发展的素养，而学生中日益涌现出来各种寓于特色的个人发展案例，也让他十分欣慰。他们可以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适应且发展，也并未被大学教育所限制，而是获得了更广阔的探索空间。

“例如，毕业生薛伯特已经以电子音乐制作人和 DJ 的身份正式签约美国 Tazmania 唱片公司。而西浦给了他这种个性发展、自由生长的土壤。”他笑道。

(来源：《中国科学报》2016-06-23)